





著名华人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丁肇中的父亲丁观海和母亲王隽英抗战时期曾在四川省立教育学院任教。丁肇中（前排左）1942-1945年就读于四川省立教育学院附属小学。<sup>1</sup>

<sup>1</sup>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03-校史馆资料-2.0008。



苏葆桢<sup>1</sup>作品<sup>2</sup>

<sup>1</sup>苏葆桢(1916.5-1990.6)，江苏省宿迁人。自幼受其父熏陶，以善画闻名于乡里。1939年考入中央大学艺术系，获得艺术大师徐悲鸿、傅抱石、陈之佛、吴作人等的教诲。学生时代即开始创作，并举办个人画展，作品荣获1941年全国美术作品展览青年画家一等奖。1956年起在西南师范学院（西南大学前身之一）任教，曾兼任重庆国画院副院长。苏葆桢擅中国画，尤长画葡萄，人称“苏葡萄”。代表作有《川西三月》、《硕果丰收》和《鸚鵡孔雀》等。

<sup>2</sup>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4-HH-5。

# 刊首语

□文/张晓华

“纷纷红紫已成尘,布谷声中夏令新。”不知不觉中,春天已随落花去,夏天披着绿叶如约而至。携着暖风,迎着灿阳,新一期的《西南大学记忆》又与您相会了。

岁月悠悠,往事不再。转眼之间,一些曾经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物,已成为记忆中的碎片,飘零在岁月的痕迹中。我们虔诚地追根溯源,苦苦地寻觅着那些人,那些物,甚至是整个学校的变化和足迹,将其中的点点滴滴、丝丝缕缕永远汇聚在《西南大学记忆》的长河中。重拾记忆,再现历史,是我们不变的主题。我们只希望《西南大学记忆》是一串美妙的音符,轻诉着一个又一个光阴的故事,在初夏明媚的阳光温暖校园的每个瞬间,缱绻地牵出一首泛黄的歌,感动你我的歌。

让我们掀开尘封的记忆,回望曾经走过的路,在回望中懂得珍惜,在回望中展望未来。任花开花谢,任潮起潮落,留记忆与永恒。

# 西南大学记忆

2011年第2期(总第11期)

主办：西南大学 档案馆  
校史研究室

顾问：张跃光 丁忠民  
李 兰 徐仲林

刊名题字：袁隆平

主 编：邓 力

执行主编：张晓华

执行编辑：王 贤

编 委：邓 力 潘 洵 蒋 涛  
刘重来

编 辑：郭 兰 姚 恒 马云飞  
姜海庭 孙玉侠 王 智  
熊晓汶

美 编：王 珏

## 校训：



# 目

刊首语..... 张晓华

## 名师风采

4 教育显人 白水鉴心

——记四川省立教育学院首任院长高显鉴 ..... 马云飞

13 跳跃在五线谱上的人生

——记许可经教授 ..... 罗庆昌

## 档案拾遗

16 档案中的四川省立教育学院 ..... 姚 恒

## 校史校情

20 西南大学寻根(之十)

——西南师范大学的发展(下) ..... 张晓华

28 中国共产党在四川省立教育学院的地下组织活动

..... 张晓华

34 我们的“八年抗战”

——忆综合大楼的修建 ..... 王远伦 郭 兰

38 吴宓与辛亥革命

——议《吴宓日记》中对辛亥革命的珍贵论述 ..... 刘重来

# 录

## 校友天地

49 托起高科技 英力创奇迹

——记清华紫光英力公司董事长尹应武 ····· 周鸣鸣

## 西大地标

54 教工浴室 ····· 任一川 刘懋德 郭兰

## 影像记忆

56 西南农学院的群众性体育运动 ····· 王贤 牟乔雅

## 西大掌故

59 徐无闻为“鼠年”纪念章题字 ····· 邓力

## 校史论坛

60 论大学校史编纂的困惑与路径 ····· 王列平

封面人物 高显鉴

封二 丁观海、王隽英和丁肇中在四川省立教育学院时的全家合影

封三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苏葆桢作品

封底 西南大学历史沿革图

# Memory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让我们共同书写记忆,为  
西南大学创造希望与奇迹!

本刊地址: 重庆·北碚  
西南大学档案馆  
校史研究室

联系电话: 023-68250880  
13436041609

校史馆参观预约电话:  
023-68250880

投稿邮箱: xdjy2009@126.com

邮 编: 400715

照 排: 重庆新综艺图文广告

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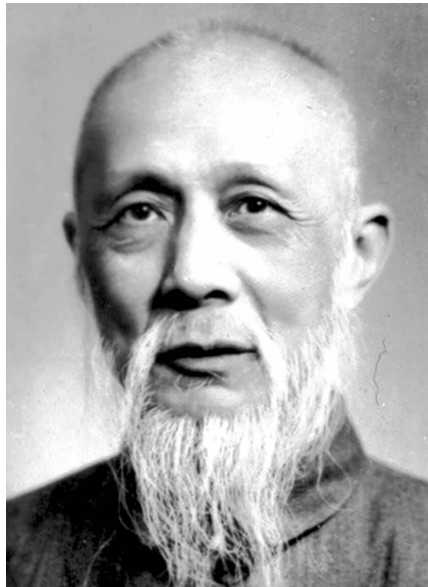


# 教育显人 白水鉴心

——记四川省立教育学院首任院长高显鉴

□文/马云飞

**编者按：**高显鉴(1893—1961)，字泳修、咏修，号谦益，广西桂林人。曾任前四川大学教授、重庆江津县长、四川善后督办公署政务处长、四川乡村建设学院(西南大学前身之一)院长及四川省立教育学院(西南大学前身之一)首任院长等职。他同情农民，坚信“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古训，并认为：“要强国富民必先从教育入手以提高全国人民的整体素质，后方能实现富民强国的夙愿。”在担任院长期间他大力推行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活动，成立现代读物杂志社，创办发行《现代读物》和《农业与教育》杂志，是沙坪文化区创始人之一，并首倡开发歌乐山风景区。他有论著数百篇，在当时学界政界颇有声誉。其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是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的典范。本期《名师风采》专栏推出了《教育显人 白水鉴心——记四川省立教育学院首任院长高显鉴》，介绍高显鉴院长的人生经历及其在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创办及发展过程中的教育事迹。



高显鉴(1893—1961)





任职江津县长时的高显鉴

众化的教育来建筑地方的自治基础，遂于1932年12月征得各方人士同意，经与四川善后督办刘湘及甘绩镛和何北衡<sup>5</sup>等商议，获得一致赞成，于是在1933年4月成立筹备处，同年10月1日正式成立四川平民教育促进会，高显鉴为理事长，甘绩镛和何北衡等8人为理事，夏仲实等人为候补理事。理事会设在重庆上清寺29号，并决定：江津为试验区，吴太仁（平民教育专家）为干事长。

试验区按平民教育之四大教育分为四部，另设社会调查部，事务方面有总务部，并设训练委员会与推广委员会。以后晏阳初<sup>6</sup>的中华平教会、梁漱溟<sup>7</sup>在山东邹平县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陶行知<sup>8</sup>在南京北郊的晓庄师范和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都先后派遣骨干力量到白沙充实试验区。参加试验区工作的多是教授、留学生、硕士及国内名牌大学的毕业

生。平教工作开展很快，成绩突出，获得社会各界好评。江津白沙试验区在很短的时间内设立了39所平教学校，招收文盲和半文盲民众入学，一次就招了1453名。参加平教教育站的学生，全部免收学杂费，课本也由平教会免费赠送，课本是平教会自己编的。在扫盲的同时，还办了一个平民阅览室。后来平教会又与中央图书馆在白沙镇合作开办了白沙镇民众书报阅览室。平教会组织了一个驴溪剧团和试验小学话剧团，经常外出演出，宣传抗日救国，并与国民政府教育部社教工作队合作在城乡推行戏剧教育等。平教试验区还在白沙开办试验农场，作为进行科学研究和示范的基地，以提高农民的生产技能和科学知识水平而达到由贫变富的目的。为了帮助农民解决生产上的经济困难，平教会建立了农村贷款所，后来又在华洋义赈总会四川分会的协助下组建了十多个信用合作社，给农民提供低息贷款，避免了高利贷剥削，同时还成立了农民消费合作社，使他们能够买到廉价的商品。平教会试验区还设立了保健院及两处医疗所。

高显鉴在筹办平教会的同时，深深感觉到本县师资严重缺乏，分配不够，遂于1933年8月创办了江津乡村简易师范学校。1938年高显鉴在白沙公园旁创办了修平幼儿园。1934年在白沙还创办了平民试验小学，1935年改为试验小学，1942年正式改名为修平小学。1941年9月在江津白沙又创办了修平中学。同时还提出筹建私立修平学院的构想，以完成从幼儿园到大学的一整套完整的教育体系。修平幼儿园、小学和中学的校名是高显鉴根据儒家经典名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要义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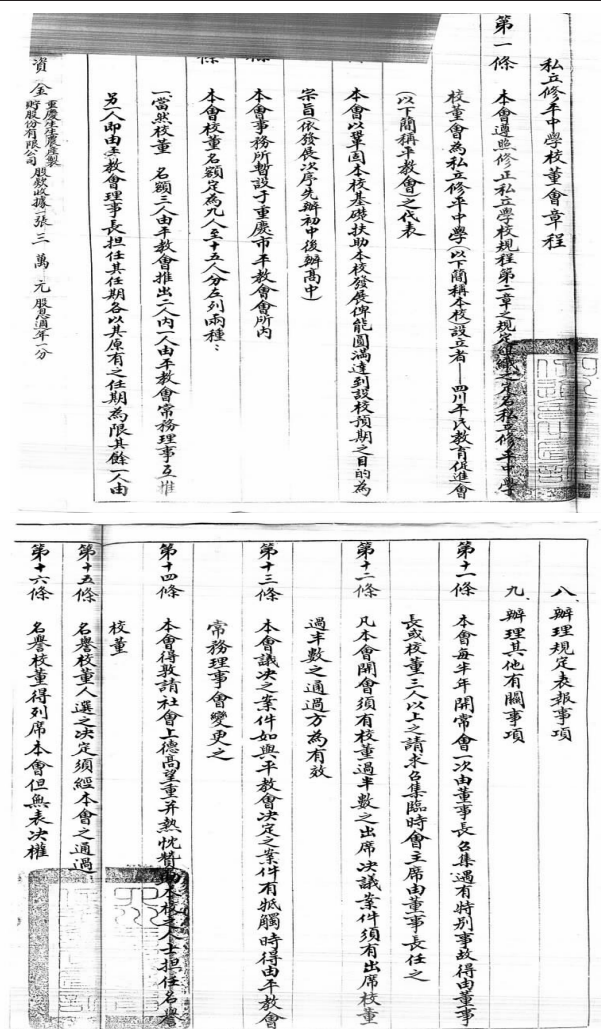
江津试验区的乡建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因该区系私人组办，官方补助极少，故经费来源主要靠私人捐赠，勉力维持开支，1936年险遭夭折，后虽获

<sup>5</sup> 何北衡(1896—1972)，字恩枢，四川罗江人。曾任四川建设厅厅长、水利局局长、中国西南实业协会总干事。建国后曾任水利电力部参事和全国政协委员等职。见《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第307页。

<sup>6</sup> 晏阳初(1890—1990)，原名兴复，又名遇春，四川巴中市人。世界著名教育家、社会学家。曾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创办私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西南大学前身之一)和组成国际平民教育运动促进委员会。见《西南大学记忆》2010年第4期名师风采专栏晏阳初介绍。

<sup>7</sup>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铭，广西桂林人。曾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院长、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央常务委员及《光明报》社长。建国后任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和中国孔子研究会顾问。见《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第653页。

<sup>8</sup> 陶行知(1891—1946)，安徽歙县人。曾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和中华教育改进社总干事。先后创办晓庄学校、生活教育社、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见《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第604页。



四川档案馆中有关私立修平中学的记载

准续办,但裁减补助费四千,同仁月薪仅七元。1937年经高显鉴四处筹募,得赞助款七万,才得以度过难关。如此艰难竭蹶,高显鉴仍苦撑无怨。在此期间高显鉴推出《四川平民教育促进会江津试验区应推动的工作之商榷》《四川平民教育促进会江津试验区农村合作社宣传大纲》等15种刊物资料宣传平教会的各项主张和精神,为教育富民强国的观点呼与鼓。高显鉴是平民教育忠诚的倡导者和组织者,江津试验区从三十年代初开始实施,历经近二十年,时间之长,人数之众实为四川及全国之最,为探索改变中国近代广大农村的贫困和教育落后的状态作出了可喜

的尝试,在这块土地上曾汇集了抗战时期全国各地来此的能人志士,为了共同的目标走到了一起,他们为教育富民兴邦的理想而不计私利、勇于实施的精神,堪称后世楷模,令人肃然起敬。经过全体乡建同仁的艰苦卓绝的努力,江津白沙区成为抗战时期大后方有名的陪都三大文化教育区(沙磁区、北碚区和白沙区)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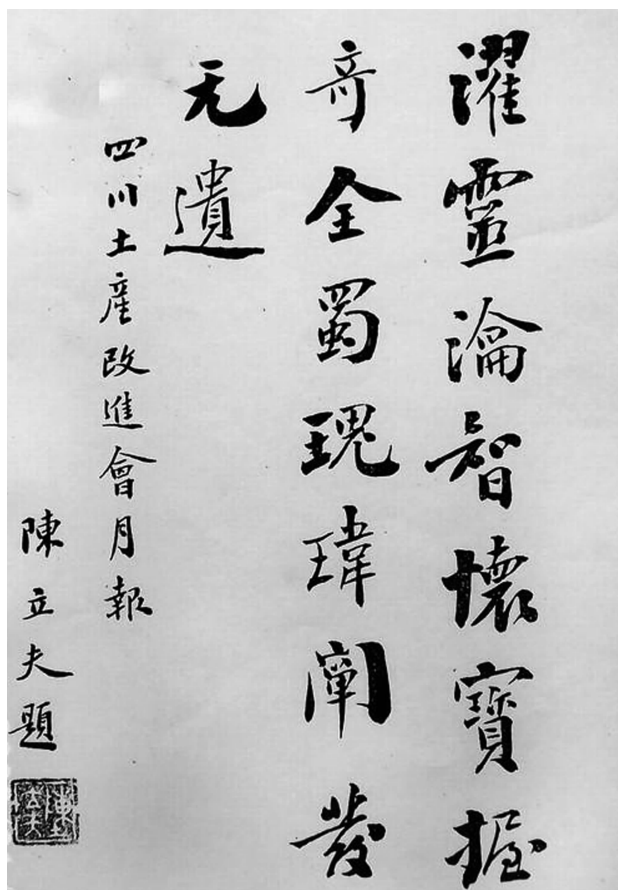
### 助推全川生产建设

1934年底高显鉴调任四川善后督办公署政务处长(主管教育厅、建设厅、民政厅三厅工作,职权范围为四川省政府政务),次年他向刘湘提议召集全川生产建设会议,得到刘湘的赞成和同意。1935年5月3日在成都青羊宫召开了为期11天的全川生产建设大会,由刘湘任主席,甘绩镛、高显鉴任副主席,参会者共千余人。会议主要内容包括提议善后一切问题和讨论未来生产建设计划。会议分工业、农业、教育、交通、垦殖、地矿、林业水利七大类,聘请了三百多名各方面的专家人士,共同讨论了二百余案。会议还讨论了全川建设五年计划,这就是四川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生产建设计划会议。

会上同时决定成立四川省土产改进委员会,刘湘兼任委员长,高显鉴担任副委员长,并在四川各县设立分会。想以政治力量与社会力量的合作兴起四川的土产运动,该会的宗旨为:改良土货、促进生产、培植民生、充裕货源。与此同时发行了《四川土产改进委员会会刊》,陈立夫<sup>9</sup>为该刊题词。像这样召开大型的全川的生产建设大会,研讨和制定五年生产建设计划、建立指导协调全川的生产建设的组织、发行遍及全川的科技学术性刊物,这在四川历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

发展四川经济,筑路为急切之需,高显鉴极力主张修筑成渝铁路,但鉴于当时经济力薄不能独立完成,乃效仿滇越铁路办法,与法国人联合修筑,限期完成。

<sup>9</sup> 陈立夫(1899—2001),原名陈祖燕,曾用化名李永清,浙江吴兴人。在战乱期间对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晚年潜心研究中华文化,推动中医药的发展和国际认可,并竭力推动海峡两岸的交流。1993年前其经历见《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第500页。



1935年陈立夫为四川土产改进委员会会刊的题词

为抵制日货,提倡国货,高显鉴征得成都中国银行经理杨康祖的支持,在成都创办了中国国货公司,高显鉴任董事长,聘请爱国青年黄凉尘任总经理(建国后黄凉尘曾任商业部副部长)为发展民族工业开路搭桥。高显鉴在重庆还创办了生生农产制贮公司,开发农副产品,从事农业品制贮,使四川的农副产品走向城镇人民的生活。

高显鉴在兴办实业的同时也是时时围绕教育这个主旋律,在教育经费独立的呼声遍及全国时,他向刘湘提议筹办教育银行,因资金不足,遂与南洋华侨领袖司徒美堂<sup>10</sup>等发起成立华侨兴业银行,高显鉴与司徒美堂两人任常务董事。此外他还大力倡导职业教育,他是四川最早倡导职业教育的教育家。高显鉴于民国二十九年五月邀热心教育人士甘绩镛等13人为筹委会,在四川荣县思济桥创立了四川省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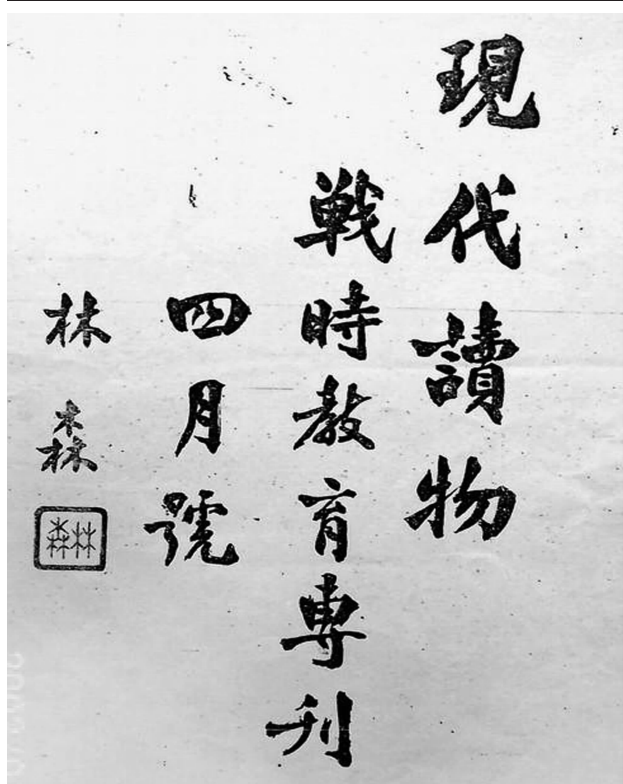
立建华农业职校,高显鉴任校董事会董事长。民国三十年荣县私立建华农业职校移交四川省立荣昌农业职校。在其倡导下,省政府为造就窑业技术人才,推行职业教育,在江津白沙成立了江津窑业职业学校等。

## 任职川教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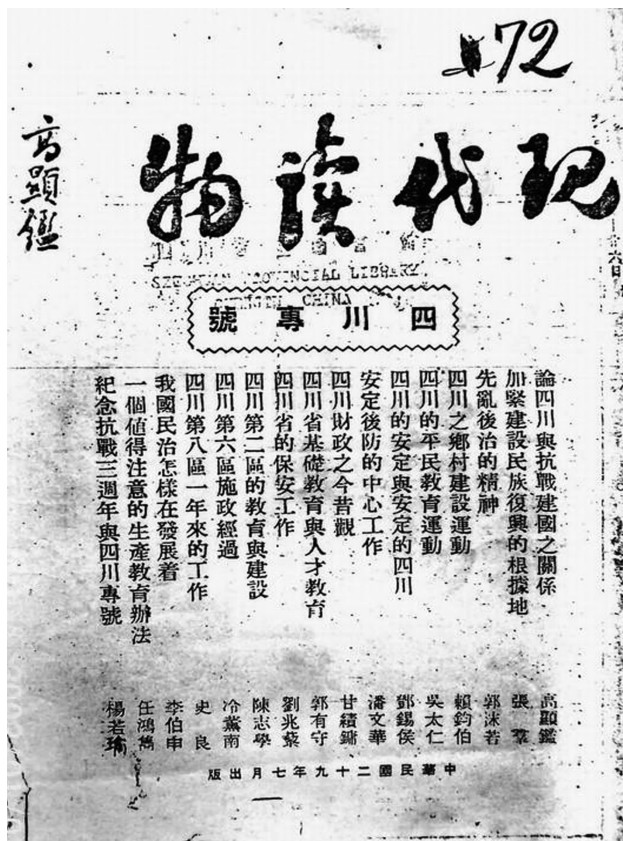
1935年高显鉴在四川善后督办公署政务处长任上刚打开局面、开展工作,又调任四川乡村建设学院(西南大学前身之一)任院长。高显鉴任院长后,为了解其它地区办学的经验,即刻派人到山东邹平、河北定县进行考察以期相互参酌比较,以便制定出更加适合于四川乡建运动的具体试验措施。同时创办了《现代读物》杂志,作为教育救国的舆论阵地。几个月后,正当高显鉴力图盛举之时,却接四川省政府训令:以资金紧缺为由,决定停办该院!是时高院长一面奔走呼吁,争取社会各界及新闻媒体的舆论支持,一面到建设厅、省政府、教育部据理争辩、慷慨呈词,说明高等教育对四川的重要意义、与外省的差距、关乎国家民族、子孙后代的兴盛等。在广泛的社会舆论支持及全院教职员学生的努力下,终于迫使四川省政府收回指令,于1936年将乡建院改组为四川省立教育学院,高显鉴被任命为首任院长。该院是当时全国仅有的两所独立的师范类公立学院(另一所为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在高显鉴任院长时在办院方针上经历了两个时期:一是1935年至1937年,该时期川教院沿承乡建院办院宗旨,培养和造就乡村教育师资和农业科学技术人才;二是1938年至1939年底,1938年川教院奉中央教育部令将乡村教育系改为社会教育系,把重点从农村师资教育改为全社会的教育,重点为四川发展中等教育培养合格师资。

高显鉴一生致力于教育和农业,认为由农业来解决民众当前的吃饭穿衣问题,再由农业而引发工业和科技的革命,反过来再由工业和科技促进农业的发展,形成良性循环,教育就是每个循环的延伸,

<sup>10</sup> 司徒美堂(1868—1955),广东开平人。曾任美国洪门堂致公党主席。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务委员等职。见《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第119页。



1936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为《现代读物》题词



高显鉴创办的《现代读物》

所以川教院的办校方针重点在师范与农科的发展上。高显鉴治院实行民主办学,不拘一格广揽人才,兼收并蓄,容纳不同的学术观点、意识形态的存在,采用走出去请进来等灵活、注重社会实践的方法探索办学新路。他聘任教师不以关系亲疏而定,不以文凭而定、不论各个学派、不论年龄长或刚毕业的青年教师,只要有学问都兼收聘用,可谓一时间川教院人才济济,这些有真才实学的或曾留学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德国、瑞士的博士、硕士、学士毕业生把国外先进的科学、先进的教学经验、浓厚的学术氛围带到了川教院,这无疑给学院以后的高速发展、培养高端人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值得一提的就是当年在学术氛围很浓的川教院长大的一帮孩子,他们大都



四川省立教育学院旧址

学有所成,最出类拔萃者当属在川教院生活了八年之久的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丁肇中教授。丁肇中在四川省立教育学院校园里度过了他一生最难以忘怀的金色童年(两岁到十岁)。川教院王隽英教授乃丁肇中的母亲,在川教院教心理学,她给丁肇中留下了“爱祖国、爱科学、双爱、双荣。少小须养正,德行可立身,若得朱紫贵,坚做廉明人”的立身箴言。1975年39岁的丁肇中教授第一次回到阔别二十八年的故土,他专程去了重庆磁器口川教院旧址。

高显鉴提倡和注重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方法和学生的动手能力。川教院的一大特点是在西南院校中有农科的设置特别是农场的设置。农场是农科学子的试验园地,学生除在本院农场试验基地每



丁观海、王隽英和丁肇中(前排左)在四川省立教育学院时的全家合影

人分有两三分地,自行实习和研究外,同学们每到假期还自动参加农场的工作,这样对他们生产技能的提高很有裨益。1938年高显鉴协同其他教授率毕业生到四川平教会江津试验区进行毕业实习,并把江津白沙区作为学生的实习基地。这在当时对培养大学生理论紧密联系实际,同时又与推行乡村建设运动、提高农民思想文化及改进农业技术相结合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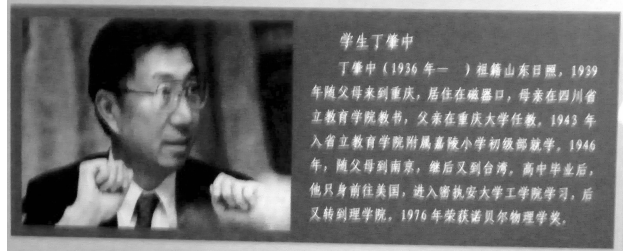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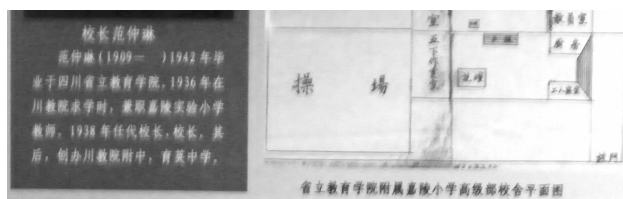
办学思路,确实是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教育模式。在培养理论联系实际的同时还要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师范生在四年级实习时要根据教学需要自己动手制造一套小学的语数教具。积极推行电化教育,设备有发电机、放映机、幻灯机及收音机等电化教学设施。1939年高显鉴在川教院创办了《教育与农业》杂志作为校刊。

高显鉴认为一个大学生不光是要有知识、品德,还要有强健的体魄,因而川教院的田径、游泳、足球排球等体育活动都开展得很好,全院师生还组织了篮球比赛,并参加了沙坪坝六校联合运动会,还聘请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sup>11</sup>为名誉会长,活跃了大后方的体育活动。该院这个时期培养出来的学生不只要学到书本知识、爱国主义思想和道德品质,还要培养学生吃苦耐劳的精神。



重庆李子坝抗战遗址公园之高显鉴宅邸高公馆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高显鉴用教授学者独特的视角,在抗日战争之前已嗅出丝丝硝烟的味道,强调四川的未雨绸缪。抗战时期高显鉴曾任军委会委员长成都行辕少将参议、国防最高委员会专门委员。在高显鉴的领导和支持下,1937年重庆成立了重庆学生界抗敌后援会,同时川教院也成立了川教院抗敌后援会,高显鉴被推选为重庆抗敌后援会的理事之一,与此同时还成立了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学生自治



四川省立教育学院附小对丁肇中教授的介绍

<sup>11</sup> 林森(1868—1943),字子超,号长仁,福建闽侯人。曾任南京临时参议院议长、福建省省长、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长、院长和国民政府主席等职。见《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第430页。

会。1938年暑假,川教院师生组织大规模暑假农村服务团,深入到农村宣传抗战及社教工作。川教院在寒假期间还多次组织抗日救亡宣传团,1939年春又组织了川教院抗日救亡宣传团进行抗敌宣传活动。高显鉴当时在四川及重庆影响较大,与鲜英等社会贤达交往密切。1946年9月国共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曾专程来到鲜英的住所特园,请鲜英电话代为约见高显鉴。高显鉴到达以后,毛泽东立即起身相迎,“久仰,久仰高先生大名”。这段秘史,是高显鉴解放后向后辈们谈起的。

对抗战期间迁来大后方的学校,高显鉴总是竭尽全力进行帮助。1938年2月由四川省立教育学院、重庆大学、中央大学等12个单位发起,同年3月成立了重庆沙坪坝文化区自治委员会,会上推举重庆大学校长胡庶华<sup>12</sup>为主任干事、川教院院长高显鉴为副主任干事、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sup>13</sup>等为委员。同时川教院奉命组成了社会教育推进委员会,在沙磁地区进行了有组织、有系统、大规模的社会教育事业,试验区由磁器口、沙坪坝、小龙坎扩展到歌乐山、高店子、上桥、石桥铺、新桥等地,从教书识字扩展到时事宣传、文艺演出、传授科学技术等方面。三十年代由川教院在沙磁区开创并经各内迁机关团体共同发展起来的社会教育事业,前后达十余年之久,建立和兴办了许多教育设施,培养了大批人才,为社会教育和农业技术的改进作出了有益的贡献。1939年5月四川省立教育学院经国民政府教育部严格考核审定为教育部颁令各级学校兼办社会教育运动中,成绩彰著的六所大专院校之一,并嘉奖其教育经费。

高显鉴在时局动荡、国难当头之际,虽曾为官多年,但他始终不能适应官场的迎来送往、喝酒吃饭、打麻将拉关系、整天沉浸在人事纷争之中,拉帮结派不干实事等官场之风。1939年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召集八大院校长会议,会上提请各大院校长加入CC



民国廿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1940年2月27日) 报纸上四川省临时参议会第二次大会特刊:“四川省教育厅施政报告”中提到“关于省立教育学院者,曾于5月间暨暑假期内先后订定调整办法,饬其改进,嗣以高院长因病请辞,由省府委颜歆继任院长,按调整计划继续实施.....”

组织<sup>14</sup>,高显鉴与重大校长胡庶华一起退却。1939年9月下旬开学,高显鉴所聘教务长到校,与此同时教育部所任的另一教务长也到川教院,高显鉴为此甚感愤然,由此大病一场,1940年初辞去川教院院长的职务。

高显鉴的性格不畏权势,不妥协,也不领受任何人的功劳。抗战前夕,国民党有一次准备抓捕两名地下党负责人,这两人是高显鉴所办实业肇明印刷公司的员工。高显鉴获悉后,立即安排两人离开了重

<sup>12</sup> 胡庶华(1886—1968),湖南攸县人。曾历任湖南大学教授、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同济大学校长、中国工程学会会长、湖南大学校长、重庆大学校长等。见《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第656页。  
<sup>13</sup> 罗家伦(1897—1969),江西进贤人。曾参与创办“新潮”月刊和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并历任清华大学校长、中央大学校长、驻印度大使、台湾考试院副院长、国史馆馆长等职。见《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第450页。  
<sup>14</sup> CC组织,即“中央俱乐部”(有的称“组织派”),它的英文名称是“Central Club”(“中央俱乐部”)。CC组织是由陈果夫和陈立夫领导的一个政治派系。1927年6月正式成立,是浙江社、西山会议派、孙文主义学会、AB团及执杖派的大联合。



高显鉴(前排右二坐者)与家人合影(1954年9月摄于重庆)

庆。后来,这两人成了共产党的高级干部。1959年高显鉴去世前夕,两人忽然来到重庆拜访高显鉴,高显鉴知道这两人来的目的是感谢其救命之恩,遂避而不见。1961年旧历7月15日凌晨,高显鉴在重庆两路口中山路242号家中病逝,享年69岁。

高显鉴认为:读书未必要做官,做官未必做大官;而是要做事,做大事,做有益于国家、民族的事,实实在在有利于老百姓的事,大事。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是一位且吟且行的歌者。他筚路蓝缕开创了四川第三个公立高等本科院校,为四川的教育夯实了基础。川教院所培养出来的学生,以后大都担任了各省立、县立中学的教导主任、校长、大学教授或出国留学深造,把四川的教育事业一代一代的传承了下去。

### 参考文献:

- [1] 抢救民间家书项目组会编. 任鸿隽陈衡哲家书[M].上海:商务印书馆,2007。
- [2] 中国教育报刊社组编,西南大学撰稿.漫游中国大学丛书——西南大学[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

[3]许增紘.办学百年的历史源头[N].西南大学校报(电子版),2008-04-09(04)。

[4]巴蜀网:<http://forum.home.news.cn/thread/68403419/1.html>。

[5]寻找历史的记忆(六)——李子坝抗战遗址公园, <http://blog.163.com/heguangyou-2001/blog/static/1005284552010731105724613/>。

[6]“沙磁文化”之发源地——古镇磁器口.沙坪坝区图书馆网:[http://mail.cqlib.cn/spplib\\_arealiterature/906.aspx](http://mail.cqlib.cn/spplib_arealiterature/906.aspx)。

[7]西南大学前身——四川省立教育学院首任院长高显鉴.天涯博客:周鸣天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661236&PostID=7136214](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661236&PostID=7136214)。

[8]周鸣天.高显鉴与抗战时期的《现代读物》[J].巴蜀史志,2010,(4)。

### 图片来源:

[1]第2、3、4、5、11、13、14张由《西南大学前身——四川省立教育学院首任院长高显鉴》该博文的作者周鸣天老师提供。

[2]第6、7、8张来源于中华收藏网。

[3]第9、10张截图于《漫游中国大学丛书——西南大学》。

[4]第12张来自《寻找历史的记忆(六)——李子坝抗战遗址公园》。

[5]第15张来自于《任鸿隽陈衡哲家书》。

注:本文在成文过程中,联系到了《西南大学前身——四川省立教育学院首任院长高显鉴》该博文的作者周鸣天老师,对于周老师在成文过程中所提供的热情帮助,谨致谢忱。

(责任编辑 张晓华)



# 跳跃在五线谱上的人生

——记许可经教授

□文/罗庆昌<sup>1</sup>

**编者按：**美妙的音乐是他一生的至爱。他一生都在追寻着音乐的梦想。他的人生是跳跃在五线谱上的人生。他曾多次拒绝国民政府和地方军政要员许以高官的引诱，毅然选择了他所热爱的音乐教育事业。他把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音乐教育事业，为中国培养了大批音乐人才，为中国音乐教育事业做出了显著的贡献。他就是我国音乐教育家、作曲家、音乐高等教育的先驱者，四川音乐教育的开拓者和奠基者许可经先生。

<sup>1</sup> 罗庆昌(1973~)，男，贵州铜仁人。1998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经济政法学院政教专业，并留校工作。现任西南大学纪委办公室副主任、监察处副处长。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3-105-053。



许可经<sup>2</sup>

“音乐美化人生，陶冶人的性情”、“音乐是天使的演讲”，是许可经教授对音乐世界的临摹与诠释。自1932年从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毕业回国后，许可经先生就全心致力于音乐教育与作曲工作，先后担任过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音协四川分会理事、西南师范大学音乐系首届系主任等职。从30年代起到1972年谢世止，许可经先生为我国音乐教育事业做出了显著贡献。

许可经，原名许存孝。1904年出生于四川省三台县一个书香门第家庭。许可经自幼勤奋好学，特别喜爱音乐诗赋。1921年考入成都省立一中，1924年考入北京大学中国音乐传习所和中国大学国文系，同时学习两个专业。1926年毕业后，许可经立志当一名作曲家。在法国，他先后考入里昂音乐学院、巴黎高等音乐师范学院攻读音乐理论、作曲等课程。此间，许可经还曾到瑞士日内瓦、奥地利维也纳研习作曲。1932年去英国曼彻斯特考察音乐教育，同年秋，结束国外学习生活回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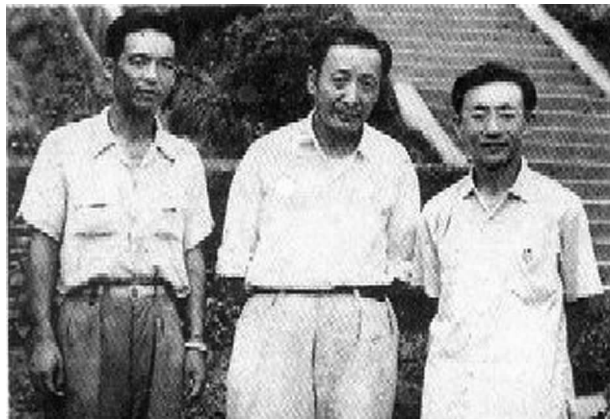
许可经先生是一位热诚教育、治学严谨、经验丰富、学识渊博的教育家。他一身正气，不媚权术，回国后，不顾家庭反对，多次拒绝国民党政府和地方军政要员委以局长、县长等职的引诱，毅然选择了他一生所热爱的音乐教育事业，先后在上海大夏大学及附

中、四川大学、四川省立第一师范、成都协进中学、重庆大学、重庆一中、重庆联中、实业中学等学校从事音乐教学工作。1949年底，重庆解放，他随女师范学院迁至北碚，在新组建的西南师范学院音乐系任教，直至去世。许可经先生把毕生的精力奉献给了音乐教育事业。

1933年夏，许可经先生从上海回到四川，到四川大学艺术系任教并兼任系主任，这是许可经先生步入高等音乐教育之路的开始。在四川大学艺术系，他仿照法国音乐教育的方法，制定教学方案，编写音乐教材，尽心竭力从事音乐教学工作。同时，为发展我国音乐教育事业，他还兼任川大女子附中和省立第一师范、协进中学等校的音乐教学工作。每日辛劳奔波，希望把自己在国内外学到的知识，特别是正统的西洋音乐系统地传授给青年学子。

1940年3月，许可经先生前往四川艺专任教并创办了音乐科，亲任音乐科主任之职。1947年，应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之聘，许可经先生南下山城，出任该院音乐系教授兼主任。1949年底，重庆解放，许可经先生便满怀热情地投入到新中国的音乐教育事业。1952年，许可经先生担任西南师范大学音乐系主任，在乐苑中孜孜不倦，辛勤耕耘，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优秀音乐人才。

许可经先生也是一位音乐作曲家。他尽管担任着繁重的教学和领导工作，但作为一位对音乐无比



1962年许可经(中)与学生罗忠镕(右,著名作家)、李先锐(左,钢琴教育家)于重庆北碚<sup>3</sup>

<sup>2</sup> 图片来源:许可经的儿子许天心的文章《音乐教育家、作曲家许可经教授》,见许天心专题网页 <http://www.fov.com>。

<sup>3</sup> 图片来源:西南大学音乐学院。



1955年西南师范学院音乐系全体教师与许可经主任(第三排右四)合影<sup>4</sup>

热爱、并有很高造诣的作曲家,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环境下,都从未间断过音乐创作。即使在吃饭、走路,也在想着心爱的音乐作曲。为此,许可经先生身上从不离纸笔,只要稍有灵感,他便立即记下。一次,许可经先生同夫人李郁文一起散步,其夫人正与之聊着一件生活趣事,聊着笑着,突然感到许可经先生没有答话,夫人一看,他却在轻哼曲调,十指比划弹琴,又已陷入了音乐作曲的“泥潭”。

许可经先生一生创作声乐作品 100 余首,其中抗战歌曲 60 多首。合唱曲《湖边女》《黄河难童船夫曲》《綦江神女》《阳关三叠》等是许可经先生的上乘之作。此外,还有《鹊桥》《天安门进行曲》等 17 首钢琴曲;《和平之夜》等小提琴独奏曲 10 余首;小品管弦乐曲 4 首。许可经先生的音乐作品,以巧妙的艺术手法与丰富的和声效果相结合,将西洋和声作曲技法同我国民间音乐素材相结合进行创作,形成了他自己的创作特色和风格:旋律深沉而抒情,节奏鲜明紧凑,音调朴实而优美,和声丰富多彩。

许可经先生还是一位爱国、爱乡的知识分子。早在 1923 年他就参加了由地下党员谭卫根、贺诚等人

发起组织的“梓光社”,宣传革命,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留学归国后,许可经先生不顾生计之苦,在极度辛苦的教学奔波中,以饱满的热情、全力投入抗日宣传活动。他与郭沫若、田汉、塞克等名诗人、词作家合作,夜以继日地谱写了大量抗战歌曲。如《救亡歌曲集》《叱咤风云集》《抗战到底》等。这些以爱国主义为主题,充满激情,旋律朴实、流畅、感人,具有民族化特色的歌曲曾在大后方广为传唱,极大地鼓舞了人们的抗日斗志。

许可经先生一生热爱生活、酷爱艺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他住在一个简陋的危房里。每逢风雨之夜,人们都提心吊胆,他却仍把室内布置得幽雅别致,特别舒适,让人时刻感到许可经先生有颗热爱生活、热爱艺术的心。

为此,人们常说“许主任全身充满了艺术细胞”。就是在思想压抑、生活困难的情况下,许可经先生仍每天早晚坚持阅读专业书籍。他的住房很小,连书架都没地方安置,于是只好把书架放在书桌上,每找一本书就要爬上桌,对此,他却风趣地说:“上楼(书桌)取书,亦一乐也。”

对于许可经先生的一生,著名诗人、作家,原西南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方敬教授作了很好的概括:“他是一位知名的音乐教育家、作曲家。他从少年时代就献身于中国的音乐事业。他为人谦逊正直,朴实诚恳;对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为音乐教育事业做出了显著的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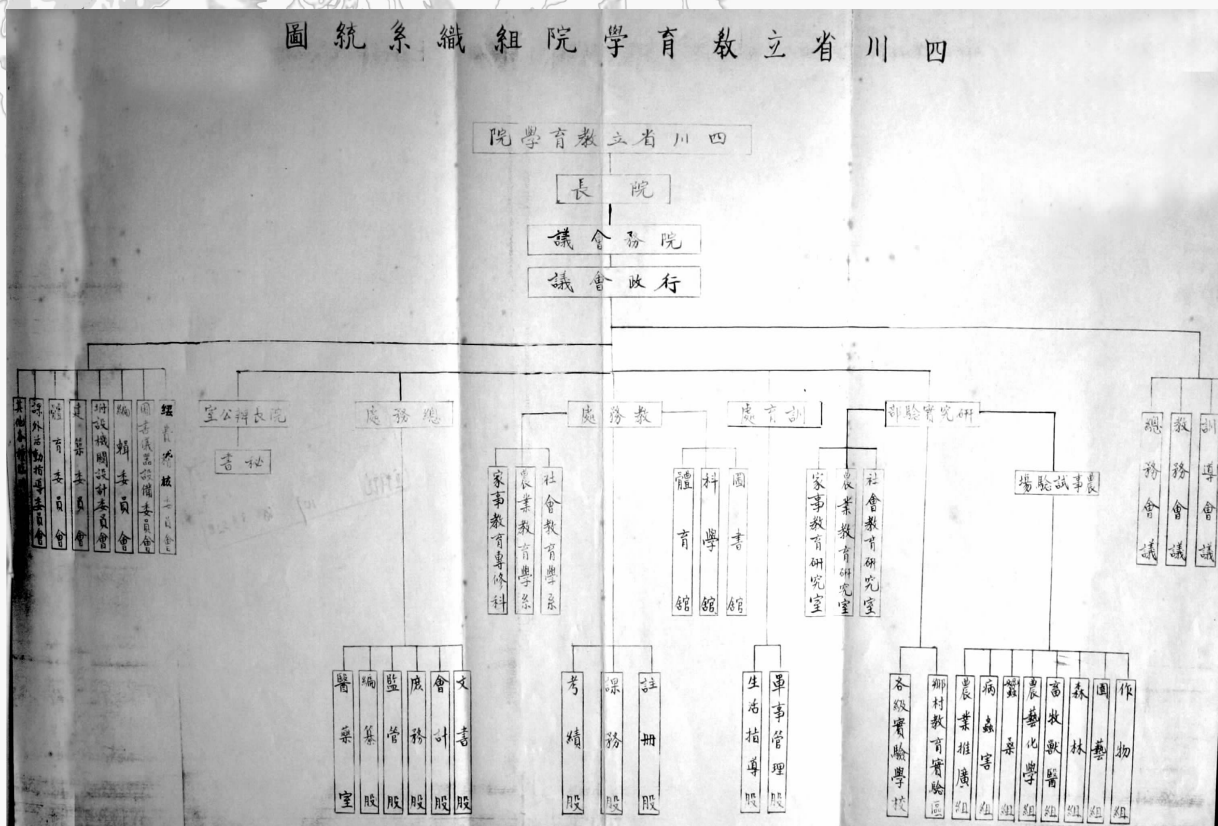
“无声的音符/化作了歌声/化作了琴音你从不发声/只默默地在听/歌声和琴音”。这是作为诗人的方敬教授对许可经先生一生诗一般的称颂与赞美。

(本文选自《缙云上下一支歌》,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责任编辑 姜海庭)

<sup>4</sup> 图片来源:许可经的儿子许天心的文章《音乐教育家、作曲家许可经教授》,见许天心专题网页 <http://www.fovh.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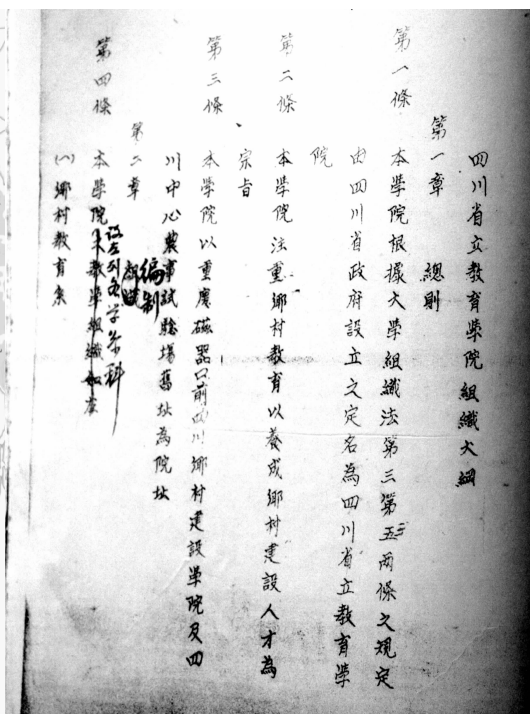
**编者按：**档案再现了西南大学发展的足迹，那一张张发黄的纸片，那一页页历史的写照，为我们轻轻开启了尘封已久的记忆之门。本期《档案拾遗》将透过档案史料，重现四川省立教育学院（西南大学前身之一）的那段久远的历史。



四川省立教育学院的组织系统图<sup>1</sup>

由于乡村建设学院之名称与当时学制不合，1936年8月省政府下令改乡村建设学院为四川省立教育学院。1937年2月，教育部批准省教厅的决定，准予设立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并将原设乡村会系改为乡村教育系，农业系改为农事教育系。学院下设总务部、教导部、研究实验部及经费稽查、图书仪器设备、学生生活指导、军事训练、编辑、附设机关设计等委员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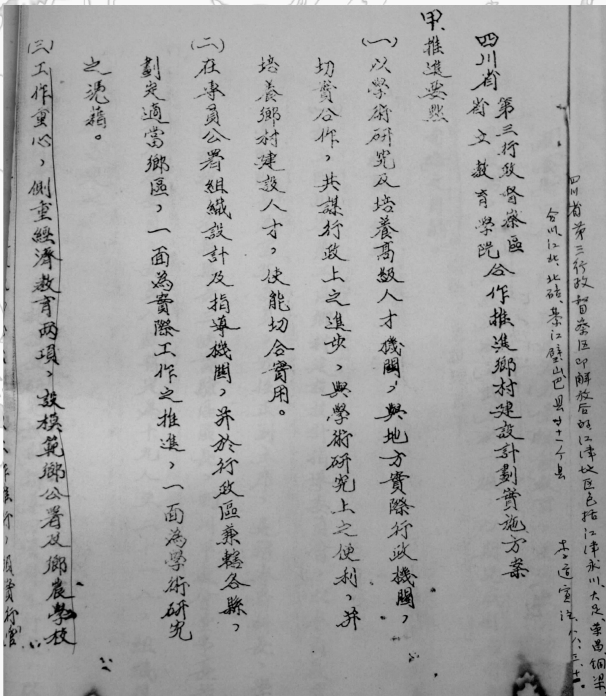
<sup>1</sup>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 0122，卷号 109。



四川省立教育學院成立初期的組織大綱<sup>2</sup>

四川省立教育學院成立初期,學院仍然以培養鄉村建設人才為宗旨。1939年10月,四川省政府頒發整頓辦法五項後,學院則側重培養各級師資及本省各大學所為造就之專門人才與在職教師進修事宜<sup>3</sup>。

1937年8月,四川教育學院與四川省第三區行署聯合成立鄉村建設設計指導委員會,設置實驗鄉,實施政教合一、破社會、普及教育,增加生產,推進了三區專署所轄十一縣的鄉建事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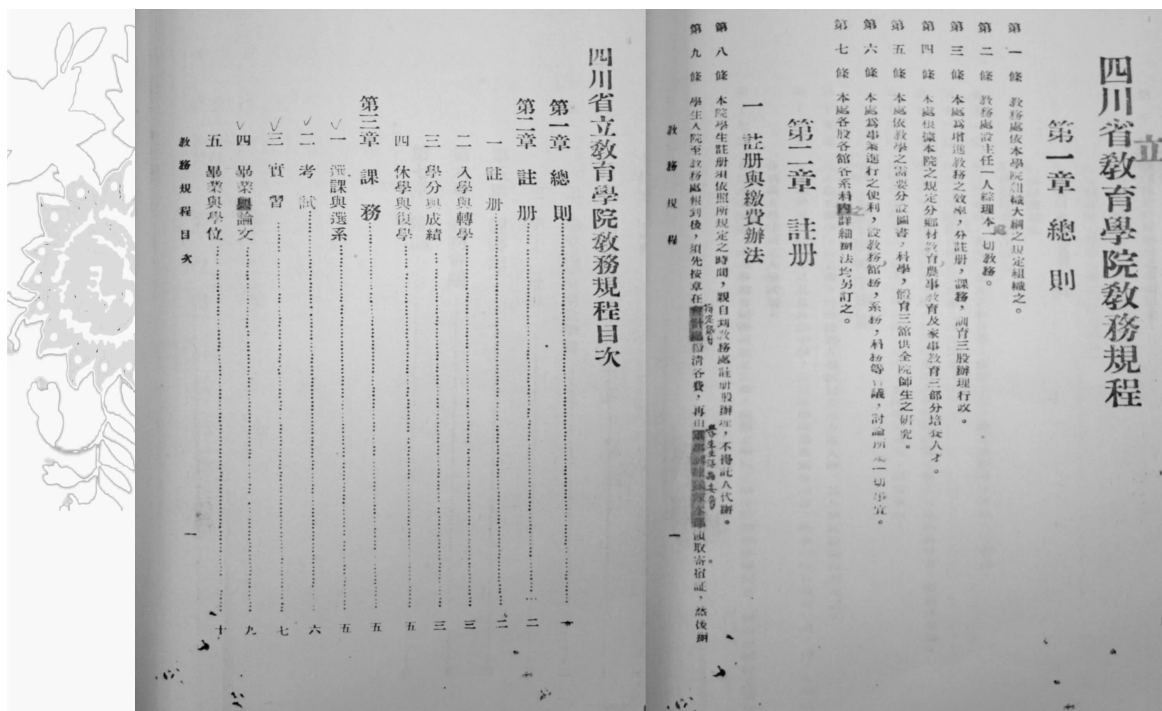
四川省立教育學院與第三行政督察區<sup>4</sup>合作推進鄉村建設計劃實施方案<sup>5</sup>

<sup>2</sup> 重慶市檔案館館藏檔案,全宗號 0122,卷號 11。

<sup>3</sup> 許增紘,潘洵,川東師範學堂與西南師範學院的組建[J].西南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5,31(3):129-134。

<sup>4</sup> 四川省第三行政督察區即解放後的江津地區包括江津、永川、大足、榮昌、銅梁、合川、江北、北碚等十一個縣(李道宣注)。

<sup>5</sup> 重慶市檔案館館藏檔案,全宗號 0122,卷號 17。



四川省立教育學院教務規程<sup>6</sup>

从高级教职员职级、薪酬一览表中,不难看出学院聚集了一批如高显鉴、胡昌鹤等知名教授,为学院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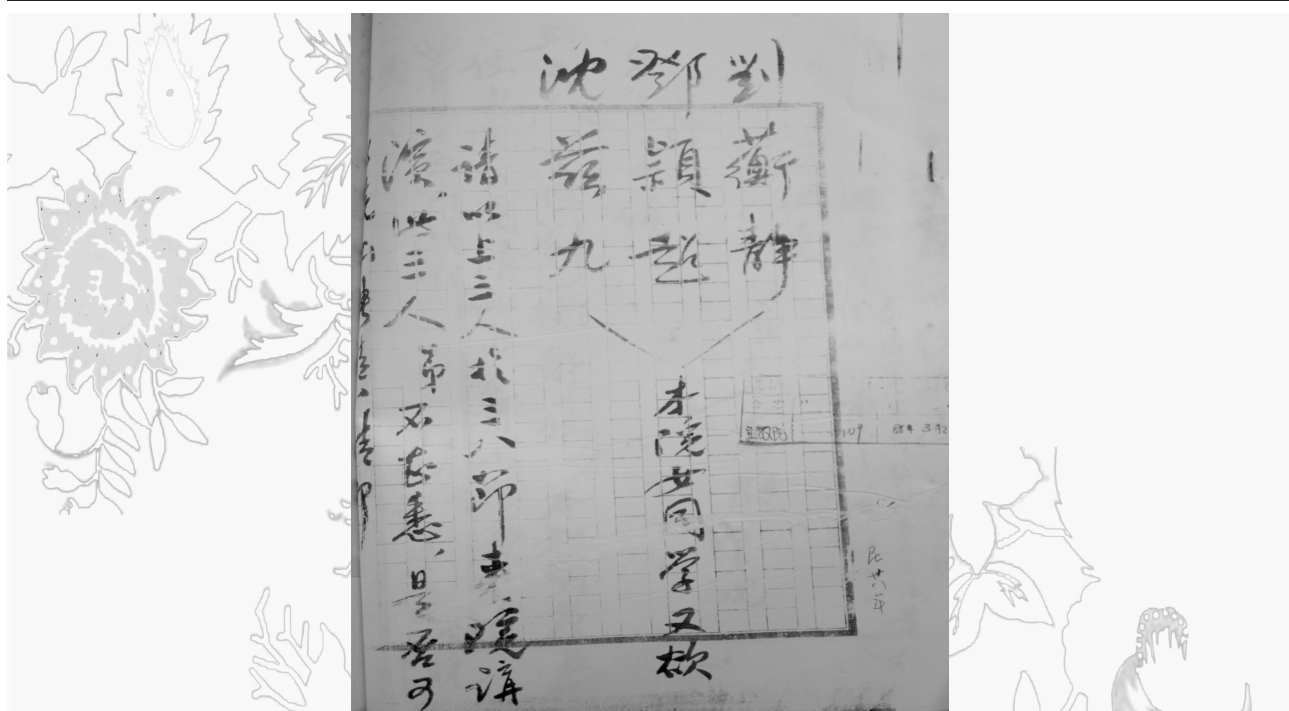
姓名	职级	聘期	薪酬
高顯鑑	院長	三年	三百五十元
胡昌鶴	主任	三年	三百元
唐世虞	主任	二年	二百元
杜元毅	主任	三年	三百元
馬壽徵	主任	三年	三百元
王	主任	三年	三百元

四川省立教育學院十六年度高級教職員姓名職級薪俸一覽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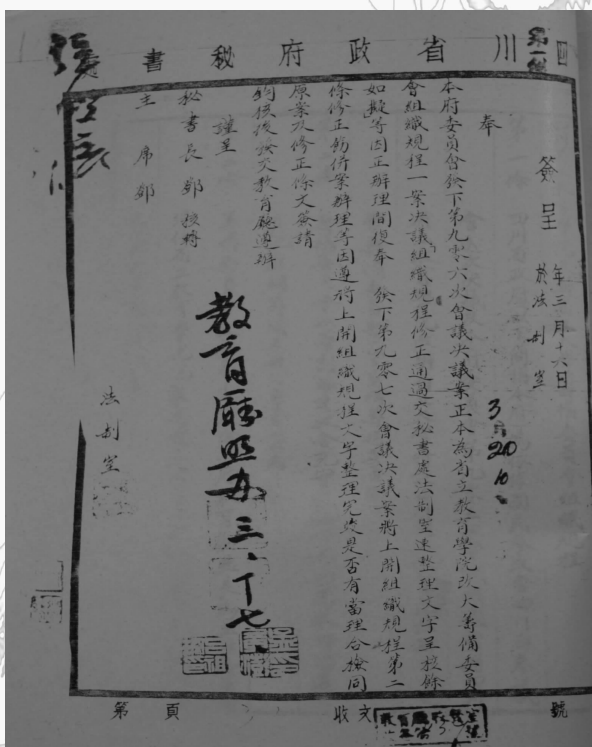
四川省立教育學院高級教職員姓名、職級、薪酬一覽<sup>7</sup>

<sup>6</sup> 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 0122,卷号 30。

<sup>7</sup> 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 0122,卷号 2。



学院积极邀请邓颖超等知名人士来校讲演<sup>8</sup>



四川省立教育学院为改办大学制定的筹备委员会组织规程获得通过的文件<sup>9</sup>

1945年秋,川教院学生自治会向院长提出了将川教院改为综合性大学的建议,在院领导和教师们的支持下,学院掀起了“扩校”(即“改大”)运动<sup>10</sup>,经过几年的努力,在1948年2月的四川省务会议上准予将四川省立教育学院改为省立大学,至此学院开始进入改办大学的筹备期,但是由于诸多原因,直到重庆解放也未能实现。

(责任编辑 姚 恒)

<sup>8</sup> 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 0122,卷号 30。

<sup>9</sup> 四川省档案馆馆藏,全宗号 107,卷号 80,页数 36。

<sup>10</sup> 《西南师范大学校史》编修组编,西南师范大学校史,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 西南大学寻根(之十)

## ——西南师范大学的发展(下)

□文/张晓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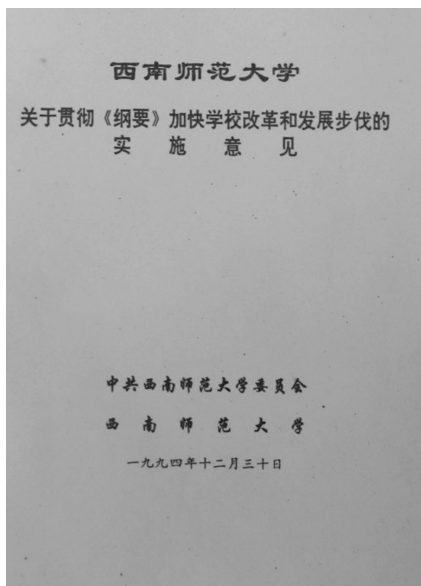
**编者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学校的工作重点也转移到努力办好社会主义的高等师范学校上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学校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为基础教育服务，事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经过近三十年的改革和建设，学校在办学规模和办学层次上有了很大的发展，在教学、科研等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逐步发展成为一所文、理、工、艺、体相结合的综合性师范大学和国家在西南地区培养高层次人才的重要基地，为西南大学的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二、加快改革，学校发展呈现良好态势

20世纪九十年代，我国高等教育加大了改革发展的力度，学校也加快了改革和发展的步伐。学校按照“超常规、跨越式发展”的思路，坚持“加强基础、拓宽专业、注重实践、培养能力、提高素质”的教改思路，进行教学和办学体制改革，推行素质教育，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各项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学校的发展呈现出良好态势。

### (一)适应社会发展，扩大办学规模

1.本科规模进一步扩大。1991年至1997年，学校本科教育规模维持在5000人左右，1997年学校实行招生并轨后本科招生数开始较大幅度地增加，



关于贯彻《纲要》加快学校改革和发展步伐的实施意见(1994年)<sup>1</sup>

<sup>1</sup> 西南师范大学关于贯彻《纲要》加快学校改革和发展步伐的实施意见，西南大学馆藏档案，01-1994-DQ11-11.0001。

1999年招生人数增加到2236人,全日制本科学学生总数达到了7500人。同时,学校的院系、专业设置也发生了较大变化:从1993年起,学校先后增设了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等10个本科专业,并在部分专业招收了职教师资;从1994年起,学校开始建立学院制,先后成立了体育学院等11个学院。1999年,学校结合自己的办学实际和重庆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成立了高等职业技术学院,为社会培养面向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的高技术应用型人才。<sup>2</sup>经过不断发展,学校初步形成了文、理、工、艺、体等学科门类比较齐全的格局。

2.研究生教育快速发展。1992年,学校获得了本科生免试攻读研究生的资格,同时拥有了研究生入学自考权。同年,学校成立了研究生部,研究生教育走上了更加规范的轨道,研究生教育有了快速发展。办学形式增多了,除国家统招、计划外委培、定向自费研究生外,还采用教育硕士专业学位、“两课”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课程班等多渠道、多形式培养人才。研究生招生人数也逐年增长。20世纪90年代初,研究生教育规模相对稳定,每年招生人数一直维持在100人左右。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学位点数量的增加,招生人数增加到150人左右。到1999年,招生人数增加到了230人左右。

3.预科教育有了发展。1993年,学校成立了预科部,具体负责预科层次的教学和管理。学校每年招收少数民族预科生100人左右,边远地区预科生60人左右。

4.发展专科教育。随着国内经济迅速发展,急需各类短、平、快的应用型人才,学校及时发展了专科教育。到1992年,学校有22个全日制专科教育专业,学生达2141人。为了提高办学层次,学校从1997年开始大幅削减专科规模,1998年全校仅有全日制专科学学生403人,到1999年,各院系均停止招收全日制专科学学生。

5.继续教育快速发展。学校成人教育除函授、夜大学之外,还招收了成人脱产班和各种专业证书班,



有关专家来校听取扫盲工作汇报(1997年)<sup>3</sup>

1993年招生人数为2706人,1999年招生数达到6661人。自1991年以来,9年中学校成人教育共为地方培养各类人才30000人。教育部西南高师师资培训中心<sup>4</sup>除承担高校师资培训外,还举办中学教师研究生课程班,并承担中小学骨干教师国家级培训任务,为西南各高师院校培养了各类师资3223人。教育部西南教育管理干部培训中心继续致力于西南五省、区教育管理干部的培训工作,中心举办了多期培训班,还举办了教育管理专业专升本函授班和教育管理专业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先后培训了4000多人。1996年,学校成立了全国唯一的一个扫盲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开展扫盲教育,为中国扫盲和扫盲后继续教育的有序推进服务。

## (二)推进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

90年代初,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特别是乡镇企业、中小企业的崛起,不仅需要大批高素质的企业家和经济管理人才,而且还需要更多的生产第一线的应用类人才。加之基础教育改革和职业技术教育的蓬勃兴起,要求师范院校培养能更多地履行多样化职能的新教师。而学校原有的学科专业,显然不能适应这一发展。为了主动适应社会需要,为经济建设主战场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学校结合国家《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和教育部师范司《高等师范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

<sup>2</sup> 关于成立“西南师范大学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的通知,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1-1999-XZ12-1.0008。

<sup>3</sup>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1-1997-SX121-1.0019。

<sup>4</sup> 1999年10月,教育部西南高师师资培训中心更名为教育部西南高校师资培训中心。

## 校史校情

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实施,提出“本科新专业努力办出特色,争上水平,专科专业注意面向社会需要,办出特点,大力发展职后教育和毕业后的继续教育”的发展思路,进一步推进教学改革,优化专业结构,改革单一的培养目标,增强办学能力与活力。

### 1. 加强专业建设

为了主动适应社会需要,学校在确保为基础教育培养师资的前提下,进一步挖掘潜力,拓宽培养目标和规格。在扎扎实实办好师范专业的同时,适当增设非师范专业,重新构建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拓宽了专业口径,调整和优化了专业结构。1990年以来,学校先后增加了20个非师范本科专业(包括一部分师范与非师范兼有的专业),并增设了应用电子技术等78个本科专业方向和企业财务管理等10余个专科专业,为社会培养了大量各类经济建设人才。从1992年起,学校先后开设了文秘、摄影等辅修专业,拓宽学生知识面,培养学生“一专多能”,为社会培养复合型人才。<sup>5</sup>在继续教育方面,十年里相继设置了60余个本专科成教专业,开设了计算机应用等19个本、专科自考专业,承担了四川省高等教育音乐、美术两个专业的自学考试主考任务,举办了成人高教预科和第二学历教育,设立了教育部高等学校远程与继续教育管理干部培训中心,进一步拓宽了学校服务功能。

### 2. 建立新的课程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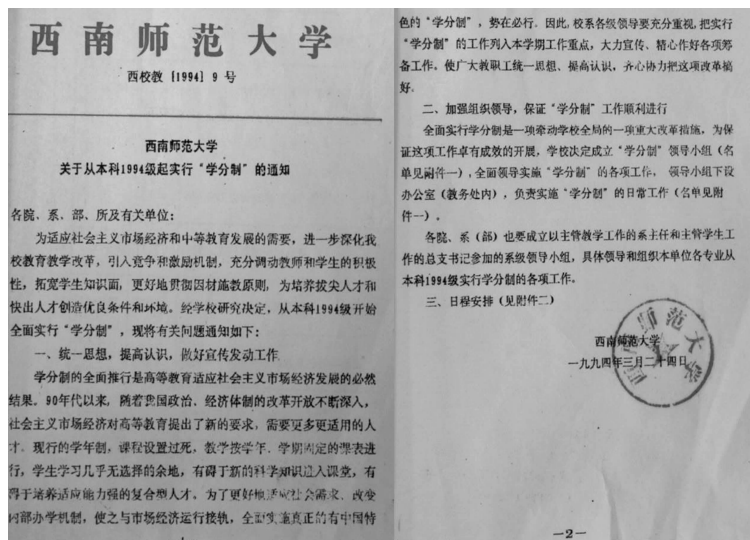
根据社会对人才需求结构的变化,学校相应地调整人才培养规格和目标,修订人才培养计划,优化课程结构,更新教学内容,建立新的课程体系。在基础课中增设了一些相邻学科和边沿学科的课程,并开设了教育技能、公共关系等应用性和技术性课程,加强教育理论教学和基本技能训练,使学生接受初步的应用方法和技能训练;增设了有利于拓宽学生知识面、培养学生能力及技术性、应用性的选修课,全面完善了选课制度,确定了选修课的合理比例,允许学生跨专业、跨学科选课,并注意选修课

程系列化,不断丰富、完善师范本科学生的整体知识结构;开列了文化素质教育必读书,在计划中设立了专门的创新学分,突出以培养学生文化素质和创新精神、实践能力为重点的素质教育;继续强调学生外语、计算机能力培养的同时,要求拓宽专业基础,促进文理渗透。

1997年,学校对研究生培养方案进行了全面、系统地修订,对现有的29个硕士点修订了培养方案,本着“宽、深、新”的原则设置课程,调整教学内容,把计算机课程作为所有研究生的必修课,把博士研究生的公共政治理论课改为专题课,增开选修课,提倡跨学科选课,拓宽学生知识面,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教育硕士专业和“两课”教师研究生的培养则强调与自身工作实际密切结合,用所学理论去分析解决自己教学中的问题。

另外,成人教育各专业也多次修订教学计划,制定适应社会发展新形势的课程体系。同时,成教院还参与制定和编写了9个师范专业专升本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的工作,参与四川省教委成人教育办公室指导的部分专业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的制定和编写工作。

从1996年开始,学校积极参与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工作,把培养和提高学生素质作为重点,抓好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



### 全日制本专科开始实行学分制(1994年)<sup>6</sup>

<sup>5</sup> 西南师范大学关于开办辅修专业的意见,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1-1992-JX1311-11.0015。

<sup>6</sup> 西南师范大学关于从本科1994级起实行“学分制”的通知,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1-1994-JX1315-1.0002。

课程体系的改革,拓宽专业口径,改变狭窄的专业教育,建立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优化学生知识结构,增强学生的适应能力。

### 3.加强教学管理

为了促进教学工作更加规范化、科学化和制度化,学校相继制定了《关于加强本科教育的几点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教学工作的意见》《中期改革筛选办法》等一系列教学管理制度,规范了学校教学改革和建设工作的各个环节。成立了由专家和教授组成的校级、系级评估小组,开展课程、教材和教研室等评估工作。建立了教学指导委员会,加强了教学检查,坚持校、院系领导听课制度,坚持有关领导和教务管理干部定期和不定期地到各教学区检查教学情况。1994年,全日制本科实行了学分制教学管理制度,并配套建立了选修、免修、免听等一系列规章制度。<sup>7</sup>同时,学校采取加强题库建设、改革考试方法等一系列有效措施,从严治学,狠抓考风,收到了显著的成效。这些措施,有效地加强了教学管理,提高了教学质量。

### 4.改进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



少数民族学生在学习计算机(1995年)<sup>8</sup>

在新教育观念的指导下,学校特别注重对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鼓励教师把传统的教学方法与最先进的教学方法结合起来,关注对学生思维的启发、指导和引导,大力提倡启发式教学,要求教师在课堂上做到“讲”“思”“练”“用”的有机结

合,使“教”与“学”达到统一。学校积极倡导、鼓励并组织各院系和教研室开展教学研究活动,推动教学改革,同时还多次开展青年教师课堂教学比赛,推动青年教师积极提高自身水平,全面提高教学质量。学校还聘请校内外专家为广大师生讲授有关教学方法的观摩课,并结合具体的教学实际,引进国内外现代教育技术,不断改进教学手段和方法。

随着计算机的日益普及,学校十分重视计算机在教学上的应用,采取切实的措施发展文科实验教学,推动计算机及其它现代化教学手段在教学领域的应用。学校率先在计算机科学系和电化教育系开设了计算机辅助教学课程,还对教师进行多媒体教学技术培训,并在校内开展了课件制作与网络技术教育立项研究工作。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改进进一步提高了教学质量。

### 5.加强学科建设

从1995年起,学校进一步加大了对学科建设的投入,设立专项经费扶持重点学科和优势学科,成立了专门的出版基金,资助高水平学术著作的出版,为学科建设创造良好的条件。学校在全力稳内的同时大胆引进人才,并从工作环境等方面给予特殊待遇。在确定重点学科的基础上,选准学术带头人和接班人,逐步形成学术梯队,并积极为学术带头人创造条件。同时学校还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选拔一批结构合理的学术群体,充分发挥学术群体的优势。<sup>9</sup>另外,学校还加强了导师队伍的建设,用科学研究带动学科和学位点建设,培植新兴学科、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通过10年的努力,学校学科建设和学术水平不断提高,学位点建设也取得了较大的成绩,新增硕士学位点20个左右、博士学位点3个、博士后流动站1个,在课程与教学论、基础心理学、中国现当代史、植物生态学等若干领域已形成自己的优势和特色。

### (三)拓展研究领域,促进科研发展

学校坚持“教学为主,科研为重”的指导思想,加

<sup>7</sup> 西南师范大学关于从本科1994级起实行“学分制”的通知.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1-1994-JX1315-1.0002。

<sup>8</sup>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1-1995-SX122-1.0023。

<sup>9</sup> 印发《西南师范大学关于学术梯队建设的有关规定》的通知.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1-1997-XZ12-6.0003。

## 校史校情

快科研改革步伐,增强科研活力和后劲,把国家和地方改革以及经济建设中急需解决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为研究的主攻方向,大力加强应用学科的研究,新建了一批紧贴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新兴学科。学校除继续加强多渠道争取科研任务和经费外,还建立了配套的激励机制,在系统结构、运行机制、科技投入、分配制度、队伍建设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稳妥的改革,进一步调动广大教师、科研人员从事科学研究和科技成果转化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科研成果取得了显著成绩。

### 1. 建立健全科研机构

1996年,学校对研究机构实行分类管理,所有研究机构一律实行所长(或中心主任)负责制和任期目标制,逐步建立起现代科研院所制和“开放、流动、竞争、协作”的运行机制。学校的研究所(研究中心)有了很大的发展,到1999年时发展到45个。在建立和健全研究所(研究中心)的同时,学校还本着“集中资金,分批建成”的原则,在国家重点发展的领域,着手重组研究机构,优化配置科研资源,建立先进的科研基地。

### 2. 多渠道促进科研工作

首先,加强科协工科。到1999年底,有471个省市级以上的学会在学校发展了会员,进一步促进了学校学术交流与合作。其次,改革校基金项目管理办法。1996年,学校设立配套资助项目,由学校和所在单位各出资一半对获准项目进行资助。1997年又在校基金项目中设立招标项目,充分发挥了校基金项目的育苗作用和导向作用。再次,发展学术刊物。《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经过多年的发展,进入了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论文分析数据库统计核心期刊及世界博览期刊行列。《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也于1996年进入了中国自然科学类核心期刊行列。最后,开展学生科技活动。学生会配合团委、科研处等部门,通过“专家论坛”、“科技设计与制作大赛”等特色活动,加强学生创新意识和科研能力的培养。学校在全国“挑战杯”大学生课外科技作品竞赛中多次获奖。



部分科研成果(1995年)<sup>10</sup>

### 3. 科学研究成效显著

学校积极拓展科研项目来源渠道,除争取教育部、科技部等部门的支持外,还争取地方政府的支持,并与企事业进行合作开发,科研项目和经费实现了稳步增长。在科研项目方面,从1991年到1999年,学校获得各级各类科研项目509项,其中国家级以上高层次项目88项,在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国家863高技术项目等方面都承担了项目。在科研经费方面,1991年总计59.27万元,1999年增加到714.00万元,增加了12倍。同时,学校的科学研究在层次和水平上有了不同程度地提高。在心理科学和教育科学研究、古文献考校与整理、群论研究等方面形成突出的优势与特色,在化工、轻工、电子、生物、生化、食品、材料、医药等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学校西南基地教育研究中心在云、贵、川等10多个省、市的数百所学校进行的多轮融教育思想、教育方法和教材为一体的综合改革实验取得了显著效果等等。同时学校紧密联系地方实际,主动服务地方经济建设。1991年到1999年,学校共签订技术转让(联营)合同19项,合同经费3342万元。在国土开发、资源利用、城乡建设等方面作了大量的研究与探讨,产生了较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如1997年,学校对三峡库区移民开发、文化保护等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向重庆市委、市府及有关部门提交研究报告50余份,为有关部门领导提供决策参考,产生了良好的反应。

<sup>10</sup>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1-1995-SX122-1.0021。

### 三、深化改革,学校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进入新世纪后,学校根据国家的一系列战略部署和学校的实际,本着“依法治校、勤俭建校、质量兴校、学术强校”的理念,进一步深化改革,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在坚持竭诚为基础教育服务、师范专业与非师范专业协调发展、职前教育与职后教育相结合的同时,重点对办学规模、学科和学位点建设、科学研究和后勤改革作了调整,以质量求生存,以改革求发展,向着“以教师教育为主要特色、高水平的教学研究型的综合性大学”的目标奋勇前进。

#### (一)进一步扩大办学规模

学校积极改善办学条件,加大了对基础建设和设施的投入力度,办学规模进一步扩大。首先,办学用地进一步扩大。2000年8月,学校与原重庆市轻工业职工大学合并<sup>11</sup>;2002年又签订置换原总参51研究所营院近600亩土地协议,使校本部土地增至2135亩。<sup>12</sup>同时学校还特别注意与地方教委和用人单位加强联系和协作,积极开辟校外办学基地。其次,办学模式多元化。为了提高办学层次,加大高层次人才培养力度,在办学模式上积极探索,大胆创新。积极发展全日制本科和研究生教育,适度发展网



重庆市轻工业职工大学正式并入西南师范大学  
(2000年8月)<sup>13</sup>

络教育,控制发展高职、成人教育,形成了全日制、成教、网络教育相结合的多形式、多层次、多规格的多元化办学模式。同时加大了对成教办学结构的调整,重点发展了函授教育、社会培训等,适度减少了校内成人脱产班的招生人数。再次,招生规模进一步扩大。本科生的招生范围从20多个省市自治区扩大到全国。2003年,学校共全日制本科生7493人,研究生教育、成人教育、网络教育、高职教育、留学生教育的招生等也都呈现很好的发展势头。到2005年,学校共有各类在学学生60000余人。

#### (二)深化教学内容和课程改革

学校坚持“把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改革作为课程建设的重点,吸收本学科发展前沿的最新成果,跟踪当代科学技术和人文社科发展的最新成果,充分体现教学内容的科学性和先进性”的指导思想,进一步深化教学内容和课程改革,在注重专业结构的优化同时,注重师范生职业素质教育、文化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的结合,着力凸现教师教育特色,增强学校的综合性。

首先,加强了课程体系的改革。在改革教师教育传统“三课”(即教育学、心理学和学科教学法)基础上建构融专业性与师范性相结合,强调理论培养、实践训练与教学艺术养成的教师教育课程体系和以创新教育为重点的实践教学体系。同时,学校将课程建设分为精品课程、重点课程和达标课程三级,有计划、有步骤地对全校各学院中基础条件好、学生受益面广的公共课和专业基础课进行重点建设,建立“宽、精、新”的课程体系,逐渐形成一批国内有影响的精品课程。

其次,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在加强学生基础知识培养的同时突出素质教育,增设文化素质教育通选课,开办文化素质教育专家系列讲座,联合建立文化素质教育实践基地,举办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成果图片展等,逐步建立起融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素质提高为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同时,坚持德育与智育

<sup>11</sup> 关于同意重庆市轻工业职工大学并入西南师范大学的通知,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1-2001-XZ12-3.0003。

<sup>12</sup>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关于对《西南师范大学关于置换总参机要局51研究所装备实验大队所属重庆市北碚区天生房地产业的复函》的复函,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1-2001-XZ11-9.0001。

<sup>13</sup>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1-2001-SX122-1.0033。



重庆市“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成立庆典研讨会(2001年)<sup>14</sup>

结合,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结合,课内与课外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点与面结合,对学生进行全方位的思想品德和政治素质教育。学校还将文化素质教育纳入“通选课”统一管理,并于每年面向全校学生开课,同时鼓励教师根据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实际情况,自行编写和出版高质量的文化素质教育教材。

### (三)坚持为基础教育服务

1.调整专业设置。为适应高中多样化办学的需要,学校按照基础教育向职业技术教育延伸的改革趋势,加强专业改造,调整专业设置,开设了民族学、园林、市场营销等新专业,到2005年底,学校已有本科专业63个(师范专业24个,非师范专业39个),专业设置更趋于合理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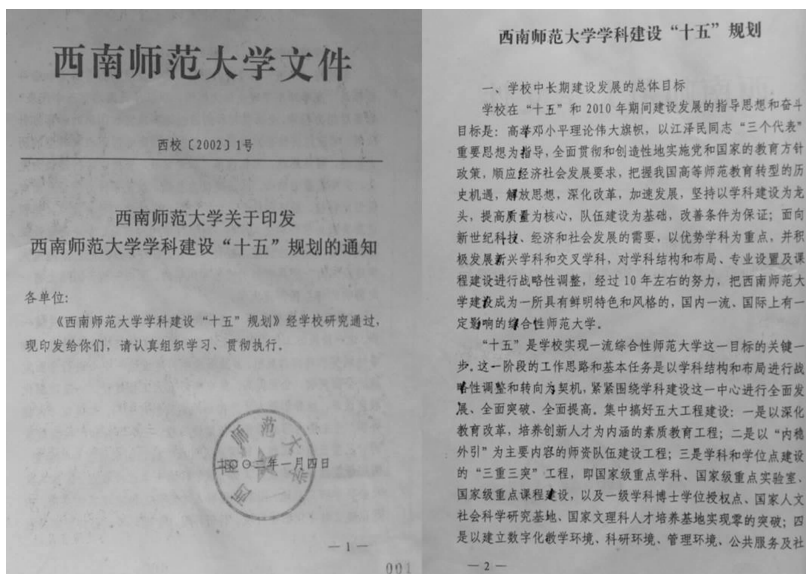
2.注重能力和技能的培养。学校狠抓教育学、心理学、教材教法的课程建设和学生“三字一话”培训与考核,还开设了“课堂教学技术”、“班主任工作”、“多媒体网络与课件制作”等与教育教学紧密相关的课程供学生选修。同时,学校还加强实验教学环节,适当增加一些设计性、综合性、创造性实验,鼓励学生自主设计实验,培养学生实践能力。考试采用多样化方式,重视

能力考核,促进学生素质提高,培养多样化复合型师资。教学手段逐步实现现代化,多媒体等技术逐渐在教学中使用。课堂教学采用启发式、研究式、讨论式的方法,重在指导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从中培养能力,提高素质。学校还不定期地开展教学评估、课堂教学比赛等活动,促进教师教学技能提高。

3.积极扩大服务面。学校根据社会需要和自身条件设置职业技术专业,培养面向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的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解决改革后高中职业技术课教师和职高专业课教师严重紧缺的问题,有力地促进了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

### (四)研究生教育快速发展

1.学科建设成就突出。学校按照“发展新兴学科、应用学科,扶持传统学科,稳定基础学科”的思路,加大了学科建设经费投入的力度,分层次、有重点地加强学位点和学科建设,调整学科结构,打造品牌学科。2003年,在第九批学位点申报和学科建设中,共获得心理学、教育学2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水生生物学、逻辑学2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23个硕士学位授权点,3个博士后流动站,实现了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零的突破。另外,学校



西南师范大学关于印发《西南师范大学学科建设“十五”规划》的通知(2002年)<sup>15</sup>

<sup>14</sup>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1-2001-SX122-1.0034。

<sup>15</sup> 西南师范大学关于印发《西南师范大学学科建设“十五”规划》的通知,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1-2002-JX1212-1.0001。

还获批高校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培养单位、全国少数民族骨干人才博士硕士培养基地。到 2005 年,学校共有 1 个国家级重点学科,4 个博士后流动站,2 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18 个学科专业具有博士学位授权权,75 个硕士学位授权点。

2. 研究生招生类别日趋完善。研究生的招生类别除全日制博士生、硕士生外,还有教育硕士、高校“两课”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高校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少数民族研究生预科、在职人员以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等类别。

3. 招生规模迅速增长。在全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事业快速发展的形势下招生规模连年以 40% 以上的速度增长。2003 年,学校共招收全日制研究生 816 人,共有全日制在校研究生 1688 人,各类专业学校研究生 600 余人,在读各类、各层次研究生达 2400 人。

4. 管理更加规范。学校制定或修订了一系列管理规定和实施办法,如《学科建设管理条例》《研究生管理工作条例》等规章制度,使研究生管理更加科学化和规范化,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也稳步提高。

### (五) 科学研究硕果累累

学校围绕学科建设,结合实际,突出重点,以重大、重点项目为载体,发挥学科交叉与渗透优势,积极组建各级各类跨学科项目组合,拓展科学研究领域,逐步形成科研结构比较合理、学科门类比较齐全、学科优势比较突出的研究体系。

#### 1. 科研项目和经费稳步增加。

进入 21 世纪后,学校科研项目及科研经费继续稳步增加。2000 年至 2002 年,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共获国家级、省部级立项项目 131 项,横向项目 39 项,其他项目 45 项,经费突破 1000 万元;在自然科学方面,共争取科技项目 237 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16 项,省部级项目 130 余项,经费达到 2566 万元。2003 年,社会科学研究方面,获准国家级项目 8 项,省部级项目 33 项,横向委托项目 39 项,到校项目经费 404 万元;自然科学研究方面,获准国家级项目 7 项,省部级项目 35 项,横向委托项目 59 项,到校项



学校举行国际学术会议加强学术交流与合作(2000 年)<sup>16</sup>

目经费 1100 万元。

#### 2. 科研水平明显提高

五年来,学校承担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科技攻关、“863”课题、“973”课题等高级别项目逐年增加,科研项目层次和科研水平明显提高。在光散射分析化学、鱼类能量、功能材料与复合材料、三峡库区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基础心理学、人类时间认知、民族教育与心理、新课程与教学改革、生态学与环境科学、生命科学与分析科学、材料科学与分析科学、逻辑学与信息学等研究领域取得了重大研究成果,出现了一批具有相当学术价值、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有重要作用和意义的课题,产生了一批新的学科群,形成了新的科研增长点。

3. 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成绩喜人。学校重视面向经济建设、服务社会发展的应用研究,在新材料、机械传动、水产、农业新品种选育、农产品加工等方面取得了 100 多项实用科技成果和专利技术,农业产业化、电子信息、草生珍稀食用菌产业化开发等项目受到社会的关注,有些研究开发成果已经被推广并转化成工业化产品,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005 年 7 月 17 日,西南师范大学和西南农业大学正式合并组建成西南大学。西南大学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扬帆起航,进入了健康发展的快车道。

<sup>16</sup>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1-2000-SX122-3.0017。

**编者按：**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从地下党在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建立第一个地下党支部至今，党领导全校师生在革命、建设、改革中走过了 70 多年的奋斗历程。从地下党支部的建立到党组织的建立与壮大，从抗日救亡的开展到和平民主的争取，从教育改革的春风到高水平综合大学的蓝图，学校始终与时代同步伐、与祖国共命运。在 70 多年的历程中，既有光辉的成就，也有艰难的抉择、沉痛的教训和深刻的反思。为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进一步坚定广大师生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信念，鼓舞全校师生员工积极投身于学校的发展建设，本刊将陆续对这 70 多年不平凡的历程做一个回顾与梳理。

# 中国共产党在四川省立教育学院的

# 地下组织活动

□文/张晓华

四川省立教育学院(以下简称川教院)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 1935 年,就有教授叶雨苍在教学中宣传进步思想。从抗日战争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川教院的师生在地下党和南方局的领导下,为维护国家主权和争取和平民主而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 第一个学联成员——刘秋篁

抗战中的川教院中共党支部是在救国会的基础上建立的。而刘秋篁是川教院最早参加重庆学生救

国联合会的人。刘秋篁是 1935 年冬农业技术班毕业后留在农场农艺科(后称作物组)工作的。<sup>1</sup>早在读书时,他从叶雨苍教授的讲课和个别交谈中受到进步思想的启迪。叶雨苍教授在讲授“农村合作”时,不但向他们介绍法国的圣西门和傅利叶、英国的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及共产主义思想,还向他们介绍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并且还结合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下出现的严重民族危机,向他们指出中国的乡村建设与合作事业的开展,必须首先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并联合一切爱国人士反对日本

<sup>1</sup> 刘秋篁.我在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参加抗日救亡的点滴活动。



成立了抗敌后援会，随后学院也成立抗敌后援会，李梦萍被选为领导成员之一。“四人小组”便利用抗敌后援会等合法组织公开进行工作。他们大约每周碰一次头，分析形势和研究下一步的工作。同时，他们还与重大的梁华昌、南渝中学的徐培光、冉达克、中央大学的黄大明等沙区其他学校的进步同学取得了联系，接上了学联关系。他们经常聚在刘秋篁的寝室，有时传达市学联的指示，有时一起研究工作等等。重庆市学联的刘传弗经常到学院来指导工作，当时重新建立的中共重庆市委<sup>6</sup>负责宣传工作的郝威（即罗青）曾两次以市学联代表的身份来学院参加救国会小组的会议，了解情况，指导工作。另外，重庆市职业青年救国会的杜延庆也曾来学院取得联系。这是川教院学生革命活动的起点。

1938年5月，李梦萍经重庆大学梁华昌同志的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为她是学联的骨干，经过了地下学联的锻炼，所以没有经过后补期。她是和重大的另一名同学一道进城，到米花街川盐二里梁华昌家举行的入党宣誓，监誓人是中共重庆市委组织部部长兼青委书记陈光（杨述）。当时川教院只有她一个党员，由冯兰瑞单线领导。<sup>7</sup>暑假后，戴凤禧、苏克新两名党员也考入了川教院<sup>8</sup>，三人便组成了川教院的第一届党支部。

### 川教院的党支部的建立

1937年学院的抗敌后援会成立后，许多活动都通过这个合法组织进行。当时还秘密成立了救国会小组，它和随后建立的中共支部逐步形成了抗日救亡的核心力量，使学院的群众运动进入了新里程。

中共川教院党支部的建立是川教院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1938年5月，李梦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学生中的唯一的党员。同年暑假后，戴凤禧、苏克新两名党员考入了川教院。这样川教院就有了三名党员。上级党组织便决定由三人组成川教

院的第一届党支部，由重大工学院一个姓冉的同学直接领导。苏克新担任支部书记，李梦萍负责宣传工作和本院学生的联系工作，戴凤禧负责组织工作并负责联系国立专科学校的党员。1939年上期，苏克新病重返回家后由戴凤禧担任支部书记。戴凤禧发展了同班同学李恩荣入党，李梦萍发展了同班同学黄育群入党。<sup>9</sup>这年暑假，傅英棠由成都建国中学考入教育学院社教系读书，组织关系也转来教育学院支部。这时，支部委员改为戴凤禧、李梦萍、傅英棠三人组成，戴凤禧任支部书记，李梦萍任组织委员，傅英棠任宣传委员。1940年上期，学校环境逐渐恶化，戴凤禧不在校内活动，也不再担任支部书记，支部书记改由李梦萍担任，支部也改由药专校职员王维章直接领导。1940年下半年至1941年又改由重大一个姓张的女同志领导。实际上当时教院的学生中还另有几个党员，一是陈如元，他是1940年暑假考入教院社教系的，党的关系却是由中央大学的白深富领导；另一个是蒋忠槐，他是1939年调到磁器口工作的，先后在嘉陵小学、育英小学教书；1940年上半年，由组织安排入川教院社教系读书。不久张国维（又名张文江）又转来学院，他曾任过沙磁特支委员，两个月后因暴露而转移，后来牺牲在渣滓洞。

1939年，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作为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中共



中共中央南方局主要负责人在重庆红岩村<sup>10</sup>

<sup>6</sup> 在敌人的破坏下，到1935年5月底，全川的地方党组织除个别保存外，均遭破坏，重庆的党组织也被破坏无遗。

<sup>7</sup> 李梦萍. 团结群众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教育学院党支部。

<sup>8</sup> 李梦萍. 团结群众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教育学院党支部。

<sup>9</sup> 戴凤禧. 我所知道的教育学院党的活动情况。

<sup>10</sup> 近代以来重庆100件大事要览, [http://www.cq.xinhuanet.com/10th/2007-01/21/content\\_9096980.htm](http://www.cq.xinhuanet.com/10th/2007-01/21/content_9096980.htm)



重庆红岩村 13 号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大楼<sup>11</sup>

中央派驻国民政府所在地重庆的秘密机关，南方局受中央委托，领导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和部分沦陷区党的工作，直接领导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等地的党组织。川教院党支部的工作也得到了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直接关怀。南方局的委员兼妇委书记邓颖超曾应邀来川教院作报告。1939 年暑假期中，党支部书记戴凤禧还参加了南方局组织的为期约半个月的训练班，接受了形势任务、战略策略和党的方针政策以及开展群众工作的重大意和方式方法等方面的培训。1939 年下期，支部书记李梦萍还曾去八路军办事处听党课，并参加过妇女生活座谈会等活动。这些培训和活动对川教院党的工作的胜利开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地下党和南方局的领导下，川教院支部积极做好本支部的党员工作，团结进步力量，发展新的党员。当时的许多活动，虽然都是通过抗敌后援会、新生活运动委员会等名义开展的，实际上在各种救亡活动中，救国会成员、中共党员及其所联系的积极分子都发挥了骨干作用。1938 年下学期，学院的抗敌后援会和女同学会改选后，党员和进步同学分别担任了这些组织的一些主要职务，黄育群任抗敌后援会主席，一位姓李的同学任女同学会的负责人，李梦萍负责学联的工作。经过发展，到 1938 年时，学校抗敌后援会的成员逐渐多了，有四年级的周景伦、周方

伯，三年级的李泰宣及李梦萍的同班同学李世瑚等，他们团结有爱国热情和进步倾向的师生，在校内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sup>12</sup>，如：开展义卖捐献；进行救亡宣传，动员群众共同抗日；组织暑假农村服务团等。支部还发动同学组建了一些学会，如社教系一年级学生成立的社教研究会、畜牧兽医系二年级学生建立的畜牧兽医研究学会、园艺系三年级学生建立的园艺研究学会，党员在这些学会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苏克新任社教研究会的主席，李梦萍在畜牧兽医研究学会中起作用，黄育群负责领导园艺研究学会，<sup>13</sup>他们通过这些学会分别把各年级的同学紧密团结在了党支部的周围。此外，川教院的支部还担负了校外的部分党员的工作，苏克新、李梦萍、戴凤禧等都曾做过磁器口天福丝厂、军政部被服厂以及药专等单位党员的组织工作；蒋忠槐做过磁器口地区的党的工作，先后任磁器口街道支部、磁器口分区委员、书记等职，张国维任过沙磁特支委员。1938 年下期，大学生集中进行军事训练，三青团在各校建立了组织，学院里的顽固势力有所加强，特别是 1939 年以后，党员们的活动受到了严密监视。由于党员们密切联系广大群众，团结进步群众，得到了进步同学的支持和保护，虽然支部的力量比较薄弱，但支部的工作一直未被破坏。1941 年皖南事变后，党支部才遵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安全撤离学校。<sup>14</sup>1946 年 1 月全国各党派代表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其中一项“一切党团退出学校”，川教院三青团分团、国民党区党部等反动组织随之退出。

## 党的外围组织的建立及爱国民主运动的开展

### （一）“民青社”的建立及进步势力的发展

1942 年后，虽然党员和进步同学相继考入学院，但院内未建立党组织。1945 年 8 月，南方局青委同意在沙坪坝区大专院校组织“中国民主青年社”，统一领导和推动民主运动。1945 年底，洪宝书等同学参加了“中国青年民主社”。

<sup>11</sup> 图片来源：重庆市渝中区红岩革命纪念馆，<http://data.jxwmw.cn/index.php?doc-view-78063>。

<sup>12</sup> 李梦萍. 团结群众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教育学院党支部。

<sup>13</sup> 戴凤禧. 我所知道的教育学院党的活动情况。

<sup>14</sup> 李梦萍. 团结群众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教育学院党支部。

1945年后,川教院的反动势力和进步力量都有所增加。一方面,川教院的中统、军统分别发展了一些成员,还有一些特务分子趁1946年秋季招生的机会进入学校,使得川教院的反动势力较前有所增加。另一方面,在青委领导下学院的进步势力也有了较大发展。首先,洪宝书等人在同学中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工作,他们不仅以交朋友的方式加强和同学们的个别联系,而且还深入到同乡会、同学会等组织中广泛开展活动,进一步密切和同学们的联系。其次,新生中的进步力量也有明显的增长,1946年许多进步的同学都考入了川教院,甚至还有一些地下党员也进入学校,团结了许多热血青年。第三,壁报社的进步力量也有所增强。洪宝书等人利用社团扩大影响,争取和团结更多的群众,推动学生运动的深入发展。除了建立一些群众性的社团组织外,还建立了《春秋报》《桂溪风》《风沙社》等壁报团体。这些社团的同学分散在各个系,他们又联系了一大批同学。这样,川教院的进步力量有了发展。在进步力量发展的同时,中共四川省委组织还对一些学生骨干进行培训。1946年7月,兰国农、易仲康等四人参加了中共四川省委组织的一次学生夏令营活动,进行了近三周的学习,提高了理论认识,丰富了实践经验。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川教院参加和组织了1946年1月25日沙磁区十余所大中学校万余学生为促使全国政协会议成功的爱国大游行,同年2月27日参加了阻止国民党所发动的反苏游行活动。1947年1月6日,



川教院学生到重庆大学参加集合(1948年)<sup>15</sup>

川教院参加了抗议美军暴行的大游行。同年6月,参加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一大批积极分子在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培养了,为学生运动的深入开展和发展党的外围组织创造了有利条件,为迎接新的革命风暴打下了基础。

### (二)六一社的建立及“四·二一”运动的开展

1947年“六·一”大逮捕后<sup>16</sup>,全市白色恐怖加剧,党所领导的革命学生运动和骨干分子转入地下。川教院的进步学生,有的转入其它学校,易地坚持斗争,有的转入农村,投身农村武装起义,有的留校继续开展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一些暂时离校隐蔽的学生,在形势逐渐平静后才回到学校。川教院的革命形势出现了暂时的低潮。1947年暑假后,随着新生的入学,不少进步学生进入了学校,同时地下党也有意识地指派了一些地下党员的积极分子,通过报考等办法进入川教院,使川教院的进步力量大大加强了。另外,全市进校的许多新生,由于经受过学生运动的锻炼,觉悟都有所提高,政治素质都比较好,但却没有形成统一的组织力量。为了把学生运动的骨干力量统一起来,中共重庆市委决定建立一个党的秘密外围核心组织,为了铭记“六·一”大逮捕的仇恨特将其命名为六一社(后改为新青社)。川教院的六一社是1947年9月开始组建的,由洪宝书、徐淮淳等人负责,成员最多的时候约有30人。川教院六一社的任务主要是继续搞好社团工作,以社团为中心积聚革命力量,扩大影响。那时的社团较多,有衡报社、风沙社、比平读书会、星三座谈会、黑潮社等等,这些社团在动员和组织群众方面都发挥了较大作用。以后,川教院还发展了一大批新青社社员,进一步增强了进步力量,为日后学生运动的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9年开展的“四·二一”运动,是解放前夕重庆规模最大的一次学生运动。随着内战的扩大,国民党走向了政治经济的总崩溃。国统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靠薪水维持生活的一般公教人员都无法照旧生活,即使待遇比较优厚的教授也难以果腹。各校教

<sup>15</sup>《历史的切片——西南师范大学老照片》编委会.历史的切片——西南师范大学老照片系列(三)。

<sup>16</sup>1947年,为了扑灭革命烈火,国民党反动派布置了一次全国性的大逮捕。6月1日,重庆市逮捕了数百名学生,即“六·一”大逮捕。

职工纷纷行动起来为维持最低的生活而斗争。教职员工的正义呼声获得了青年学生和广大群众的同情和声援。川教院学生参加了3月17日八所院校四千余学生的游行示威。4月15日,重庆学生成立重庆学生争生存联合会,决定在4月21日举行游行示威(即“四·二一”学



川教院学生集会游行(1949年)<sup>17</sup>

生运动)。国民党当局事前调动部队准备进行血腥镇压。为保存力量,避免不必要的流血牺牲,中共地下市委果断地决定改全市集中游行为分区或分校游行。川教院学生参加了沙磁区的游行。虽然当时川教院的反动势力较大,但在地下党领导下,绝大多数同学都投身到运动中,经受了考验和锻炼,为迎接解放准备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 (三)保护学校迎解放及领导机构的调整

1949年4月,渡江战役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节节败退,西南重镇重庆成了全国最后解放的一个大城市,各地的运动代表人物、社会渣滓都汇集到重庆,负隅顽抗,并阴谋在最后逃离时对重庆进行摧毁性的大破坏。中共地下组织动员和组织群众护厂护校护城,迎接解放。川教院地下党员及新青社、民青社、新行社社员和积极分子按照党的指示,全力以赴,投入了紧张的护校斗争中。他们首先通知因在学生运动中比较暴露而暂离学校的积极分子尽快返校,以便形成一个紧密联系各年级各班的核心,争取尽可能多的同学返校。接着又在党员、社员中分工调查,了解校产、档案、图书、仪器及校内各类人员的思想动态等情况,并组织同学密切注视国民党、三青团

和特务的动向,防止他们内外串通搞破坏。同时还组织采购粮食的班子,并派人到市里和省里争取拨款,想尽一切办法购买粮食和副食品。支部还发动各班同学自筹资金,准备干粮和米面,做到学校有粮,各班有粮,人心安定,有力地保证了护校工作的顺利进行。最后,学

院成立了应变委员会,在四面路口筑起“工事”,还组成了以校警为核心的巡逻队,在校内日夜巡逻。1949年11月30日,终于迎来了重庆的解放,川教院也终于完好地回到了人民手中。

重庆解放了,川教院也获得了新生。此时,地下党支部实际担负起了领导学院工作的重任。12月,学生中的新青社、新行社、民青社三个地下社的社员建立了地下社总支,发挥了组织和领导作用。1950年初,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派军代表李志刚、康之江接管了川教院,地下党和地下社组织也逐渐公开。1950年2月27日,西南文教委员会成立川教院临时院务委员会正式领导全校教学、行政工作,使教学迅速恢复。1950年3月,地下社员转团,成立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四川省立教育学院总支委员会。1950年3月,团总支公开,并在学生中两次发展了团员。随后,地下党支部也公开,当时党支部只有徐淮淳、卿德俊和冉隆娴三个党员。党团组织的公开及发展,进一步推动着学院工作的开展。

<sup>17</sup>《历史的切片——西南师范大学老照片》编委会.历史的切片——西南师范大学老照片系列(三)。

# 我们的“八年抗战”

## ——忆综合大楼的修建

□口述 / 王远伦<sup>1</sup> 整理编辑 郭兰

**编者按：**西南农学院建校初期，由于没有图书馆和实验室，学校便申请修建综合大楼以解决实际需要。当时正值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学校克服重重困难，动员师生员工参加义务劳动，历时8年之久，终于建成了综合大楼。

### 批准建楼

西南农学院建校初期，学校既没有图书馆也没有实验室。另外，当时学校集会的地点在礼堂，但礼堂太小，听报告的时候很多师生只能坐在礼堂外面听。随着学校的专业和师生越来越多，原有的临时性实验室、研究室、图书馆已经不够使用，师生对此提出很多意见，要求增加实验室和图书馆。学校根据这个情况，在四川省开会的时候提出要修建一幢综合大楼。按照李世俊<sup>2</sup>院长的想法，修建综合大楼一方面解决图书馆和实验室用房，另一方面解决全校师生员工开大会用的大礼堂。

当时正值全国大跃进时期，申请建楼相当困难，

虽说经济没有增长，但全国还是广为宣传大跃进是大建设，经济也增长了，实际上大跃进是大跃进，经济非常困难。尽管如此，四川省高教局还是根据实际情况批准四川大学、西南政法学院和西南农学院各修一幢大楼，面积各约2万平方米。当时四川大学和西南政法学院也没有足够的实验室用房。很多人对政法学院的专业不了解，感觉一个文科学校，拿实验室来干什么，其实政法学院的实验室是相当重要的，比如破案，他们需要指纹鉴定等。当然，我们就更需要实验室了。学校当时对修综合大楼这个事情非常重视，因为综合大楼的面积在当时的重庆高校里是建筑面积最大的一幢楼，在那个年代，修这么大一幢楼是很了不起的。

<sup>1</sup> 王远伦，男，工程师。1947年考入原私立相辉学院文史系，毕业后留校参加西南农学院建校工作，此后在西南农学院基建处工作长达35年之久。负责并参加了学校新建校舍、人防工程、农场建设等工程，并于1956、1963、1986年组织制定了学校总体规划等。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3-TX0408-042。

<sup>2</sup> 李世俊（1901—1962），男，山西人。1932年毕业于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农化系，随即投身于屯垦事业。曾任南泥湾垦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兼军委总农场场长、石家庄华北农业试验场场长、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计划司司长等职。1957年10月被调往重庆任西南农学院第一任院长（之前学院只有副院长），1962年被任命为党委书记兼院长。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3-SW0709-010。

20 世纪 60 年代的综合大楼<sup>3</sup>

## 设计

学校的建筑本来一直由重庆市设计院负责设计,如原第三教学楼、四教学楼。1952 年经过院系调整,由重庆大学等院校在内的土木、建筑系合并成立了重庆建筑工程学院<sup>4</sup>。因为对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的一些老师,如 1952 年带来队西南农学院实习的王德云等有较深的了解,并且也知道这个学校的实力,所以我们决定请他们负责设计。综合大楼的设计由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的王龚常负责,设计的初稿反复修改了半年之久,因为我们的要求是这幢综合大楼既要成为学校的标志性建筑,又要反映农学院的特点,如装饰上要有麦穗、棉花图案等,所以设计稿经过多次修改之后才完成。文化大革命时期铲除了综合大楼大门柱子上的麦穗、棉花浮雕图案,用红油漆把柱子染成红色,挂满了标语,还在大门口挂上红灯笼,非常壮观,有点人民大会堂的味道。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才把标语和红灯笼全部拆了。

除了对综合大楼的外观设计要求高以外,我们对其内部设计也相当讲究。为了建一个比较先进的实验室,我们要求在综合大楼的实验室内设计七种管线,其中最为困难的就是压缩机管线,因为我们没有用过。根据化学教研组的老师讲,他们在冲洗试管的时候,把压缩机打开,就可以把试管里的空气冲出来了。李世俊院长亲自带我去提空气压缩机,我们在国防仓库里提了一个六立方的空气压缩机,当时六立方以上规格的压缩机是国防设备,但学校实验室用不着这么大的空压机。后来我们在重庆医科大学(原重庆医学院)参加申请物质会议<sup>5</sup>,省高教局通知我们四川省广元煤矿有个三立方的空气压缩机,属多余物资调剂,于是学校就派了一位姓廖的老师去四川广元煤矿,由于多种原因,历经半年时间,才把这个三立方的空气压缩机提回学校。为了安装七种管线,综合大楼的走廊也设计得很灵活,以便出问题可以随时打开维修。那个时候虽然没有天然气,但还是预留了天然气管道。我们当时的雄心壮志就是为西南农学院建立一个比较现代化的实验室,给学校老师提供一个先进的实验环境,尽量满足老师的需要。

文化大革命时期,师生在综合大楼前集会<sup>6</sup>

<sup>3</sup>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SX12-1。

<sup>4</sup> 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其前身是重庆土木建筑学院,于 1952 年由重庆大学、西南工业专科学校、川北大学、川南工业专科学校、成都艺术专科学校、西南交通专科学校共六所院校的 9 个土木、建筑系(科)合并而成。1953 年云南大学、贵州大学的土木系并入重庆土木建筑学院。1954 年,重庆土木建筑学院更名为重庆建筑工程学院,成为西南地区唯一一所建筑工程学院,也是当时中央建筑工程部唯一一所直属高等院校。1994 年,经国家教委批准更名为重庆建筑大学,成为当时建设部直属重点大学。2000 年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并入重庆大学。

<sup>5</sup> 因省高教局的物资处设在重庆医学院。

<sup>6</sup>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SX12-7。

### 修建过程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综合大楼非常漂亮，但是在修建时却付出了很多艰辛。学校从1957年开始动工修建综合大楼，因为正值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如果不动工，款项就会被全部收回。当时国家管经济建设经费的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都由建设银行负责，我们把建设银行的领导请来，证明我们已经开工，他们点头同意，这才真正保住了项目，其实综合大楼真正的开建时间是在1958年。

修综合大楼的时候，除了正值国家经济困难以外，又遇中苏关系恶化和自然灾害，经费和劳动力相当紧张，李世俊院长本想在综合大楼后面修一个礼堂，用作全校师生员工集会，但由于没有经费，最终也没修成。由于劳动力缺乏，学校还号召全校师生员工参加义务劳动，挖地基、搬石头、运砖、锄草、担土。当时李世俊院长为号召师生员工共同修建综合大楼，就说“综合大楼是我们学校最伟大、最宏伟的建筑，你们参加了这个工程，只要添了一砖一瓦，都是对学校的贡献，学校永远都会记住你们。”李世俊也亲自下基层，有时候没有材料了，他把我“抓”进他的车子里，饭都没吃，就和我一起去提材料。

在综合大楼的修建过程中，也遇到过一些问题。首先是综合大楼位置的选择。我们的意见是综合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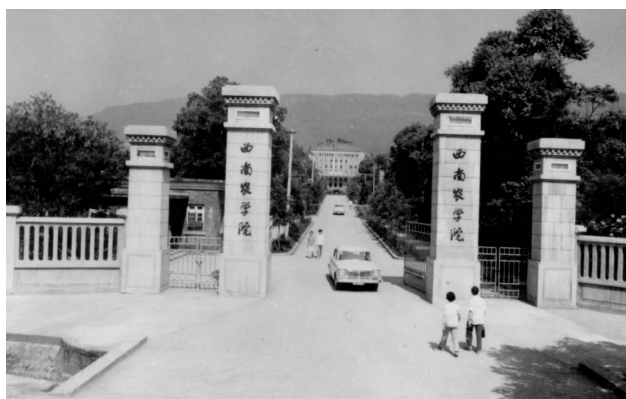
20世纪80年代的综合大楼<sup>7</sup>

楼的位置还要比现在的位置靠后一点，但有些老师觉得位置还要往前，就是要占用现在共青团花园的位置，我们坚决不同意。因为一旦占用现在共青团花园的位置，就破坏了整个学校的中心，于是我们坚决要把共青团花园的位置留住。这块土地是1953年建校初期就已经预留，距离原第一教学楼和第三教学楼的距离，宽150公尺，长200公尺，面积约3万平方米。后经多方协商，才选定了综合大楼现在的位置。这个位置原先是个柳堤，后面有一个缓坡，是种香草的地方，前面有一个月牙泉，景色非常漂亮。当时坊间有三句话：“重大有个鸳鸯路，西师有个鸳鸯椅，西农有个鸳鸯堤”。可惜的是月牙泉在修综合大楼的时候被填了。

其次是打地基。由于综合大楼所处的位置，泥土是粘性的，遇水就成稀泥，挖了6公尺深都没有硬地，于是王龚常征询我的意见，我说做个双保险，在下面加一根梁，大约深度挖了7、8公尺，才把这个问题解决。

再次是用砖困难。建综合大楼时，建筑用砖是申请物质，当时重庆市最大的砖厂是大足二砖瓦厂，二砖瓦厂是采取美国哈佛轮窑的方式生产，大概有三个哈佛轮窑，轮窑是一个名叫哈佛的人发明的，所以叫哈佛轮窑。综合大楼建造初期，二砖瓦厂给我们提供了部分建筑用砖。由于劳动力缺乏，我们带了300多名学生到二砖瓦厂运砖，从滚烫的砖窑中抓砖，持续了3个月之久。大跃进时期，建筑材料需求很大，国家无法供应材料，于是鼓励各个单位自行建厂烧砖，我们学校也响应号召自建砖厂，在学校原游泳池一带烧砖，老师学生都义务参加制砖。由于没有专业工人指导，烧的温度不够，烧的砖不合格，没用多久就裂口子。修综合大楼的时候，使用了一些这样的砖，但后来出了问题，所以我们只有把这些砖全部销毁，以免有隐患。学校将拆下来的砖，全部铺在校园内。当时校园的路不是水泥路而是泥土路，泥土路一遇到雨水就很滑，老师、学生走路很费劲，起初我们把锅炉房的炭灰铺在路面上，修综合大楼的时候，由于顶楼的砖出了问题，于是把拆下来的砖，发动教职

<sup>7</sup>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SX12-3。



从大校门远眺综合大楼(20世纪80年代)<sup>8</sup>

工用榔头把砖打碎,铺在路面上,当时学校的马路高度至少增加了三十公分。一直到文化大革命8711部队撤离学校时把路面碾坏了,学校才重新铺的水泥路。后来经过专业工人的指导,加上我们自己也积累了经验,才烧制出比较好的砖,用以解决综合大楼用砖供应不足的困难。

最后是顶楼屋面漏水。综合大楼顶楼的落水管被飘落下来的树叶堵塞了,水排不走,很伤脑筋。落水管有一二十公尺高,我们修了很多次,最后只有返工屋面,完全是由两个工人和我们干部维修的。夏天天气炎热,在屋顶工作半小时,热得内衣裤都流水,由于经费紧张,几乎都是我们自己维修的,后来换了屋面,漏水才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学校的树木很多,一遇到吹风就会飘落很多树叶,始终是个问题。

此外,在综合大楼的修建过程中,我们也遇到过危险的事情。用蓝竹搭在综合大楼前面的脚手架因支撑杆搭少了,向原一教学楼的方向全部倒了,大约有120公尺长,当时只有两个工人在,幸好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经过8年时间,综合大楼才真正修好,有老师开玩笑说,像是经历了8年抗战一样。西南政法学院也不知道修了几楼,就“半路刹车”封顶完成了,四川大

学也没有修几层就封顶了。而我们学校每年接收一些投资就修一点,总共修了8年,从1958年真正开始动工到1966年才正式完工。1959年,由于经费紧张,我们迫不得已只有压缩综合大楼的建筑面积,在原来的规划上砍掉两侧各2-3层高度,即综合大楼主体保持规划时的6层高度,南北楼4层,左右联系楼各为3层,总体面积为14510平方米<sup>9</sup>。为了凸显综合大楼,学校把一进校门道路中间的一排树木全部砍了,道路两旁的高大树木也都砍掉,重新栽上小树苗,站在校门口一眼就能够看见综合大楼。

在当时那个年代,综合大楼不仅是我们学校的一项伟大工程,也是学校的建筑代表。蒋南翔<sup>10</sup>、陆定一等领导来校视察时,就参观了这幢综合大楼。据传,蒋南翔参观时曾说:“这是重庆所有大学里最好的一幢楼。”



2010年12月,西南大学档案馆采访曾参与综合大楼修建的师生

后记:本文在成文的过程中,相继采访了多位老教师,在此特向提供热心帮助的王有超、王远伦、林元吉、陈贤源、付显兰、徐正华、陈则刚、李金泰等老师致以崇高的谢意。

(责任编辑 李亚勃)

<sup>8</sup>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SX12-7。

<sup>9</sup> 综合大楼,全部面积14,510.54平方米,包括实验室37间,研究室16间,图书馆一座(包括阅览室及50万册书库)。实验楼内全部设备除一般用水、电、卫设备外,尚有专供实验室、研究室用动力电、通风、煤气、压缩空气、给排水及消防等管线。实验楼全部为混合结构,层高三-6层(中央主楼高6层,书库5层,南北楼4层,左右联系楼各为3层),南楼是实验室,北楼是图书馆,中央主楼主要用于行政办公。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1963-XZ-77,第44页。

<sup>10</sup> 蒋南翔(1913—1988),江苏宜兴人,中国青年运动领袖、教育家。曾任清华大学校长、北京市高校党委书记,教育部副部长、高教部部长、教育部部长等职。

**编者按：**1911年，孙中山先生和他的追随者们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为中国开启了走向现代社会的大门，拉开了中华民族谋求独立和复兴的伟大序幕。辛亥革命爆发时，吴宓正在北京清华学堂读书，他从一个青年学生的视角，以其亲历亲见记载了辛亥革命爆发后在京师的所见所闻，其中既有社会的动乱、战局的进展、人心的向背，也有吴宓自己的困惑与见解。在举国上下隆重纪念辛亥革命之际，我们特意刊登了刘重来老师的这篇文章，以传承辛亥革命的精神。

# 吴宓与辛亥革命

## ——议《吴宓日记》中对辛亥革命的珍贵论述

□文/刘重来

众所周知，吴宓是我国学界公认的“学贯中西，人文楷模”<sup>1</sup>的学术泰斗和国学大师。著名学者、也是吴宓学生的季羨林在2003年写的一篇“请辞”国学大师桂冠的文章中说过：“真正的大师是王国维、陈寅恪、吴宓，我算什么大师。”<sup>2</sup>

吴宓是我国比较文学的开山祖，是中西比较诗学的奠基人，是我国最早将《红楼梦》介绍到西方的“红学家”，是著名“学衡派”的领军人物，是倡导培养中西皆通“博雅之士”的著名教育家。

吴宓从1949年至1977年在重庆生活了28年，可以说，他的一生，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重庆度过的。他是重庆的杰出名人，是重庆人的骄傲。2004年，他被评选为重庆历史名人，在重庆朝天门的重庆

历史名人馆，还有他的塑像，受到海内外人士的瞻仰。

难能可贵的是，辛亥革命爆发时，吴宓正在北京清华学堂读书。他以一个青年学生的视角，逐日记载了辛亥革命爆发后在京城引起的巨大震荡，其中包括社会的动乱、统治者的昏庸，人心的向背，战局的进展、学校受到的波及，以及个人的困惑与见解等等，内容十分丰富。

日记作为记事的载体，之所以一向受到史家的重视，是因为它不仅是当事人对历史事件亲历、目击、耳闻的记录，而且因为日记是当事人当日记当天事，所以其记载就更真切、更细腻，更具时效性，应属“第一手素材”。诚如有学者所说：“对传记的基本看

<sup>1</sup> 张岱年题词，王泉根主编.多维视野中的吴宓[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1.扉页。

<sup>2</sup> 蔡德贵.季羨林之谜[M].北京：中国书店，2008.104。

<sup>3</sup> 谢泳.教授当年[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97。

法,我是相信传记不如年谱,年谱不如日记的。”<sup>3</sup>

当时的北京,是清王朝的统治中心,也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吴宓以其亲历亲见记载了辛亥革命爆发后在京师的所见所闻,就更难得,是研究辛亥革命弥足珍贵的史料。

## 一、吴宓其人

吴宓(1894~1978),字雨僧,陕西泾阳人。1906,吴宓考入陕西三原宏道高等学堂预科,1910年毕业后考入北京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1916年毕业,于第二年赴美留学,先入弗吉尼亚大学,后转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师从新人文主义文学批评运动领袖白璧德教授,吴宓一生都受其影响。有学者认为:“吴宓先生治学走的是白璧德的路子,力求博、大、精、深。”<sup>4</sup>

1921年,27岁的吴宓归国,先赴南京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任教授,讲授《英国文学史》《英诗选读》《英国小说》及《修辞原理》等课。同年还与梅光迪、胡先骕、柳诒徵等人创办《学衡》杂志,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宗旨,吴宓自任总编辑,直到1933年终刊。

吴宓通晓英、德、法、拉丁文,曾用中、英文发表研究《红楼梦》的文章,是我国很有影响的“红学家”。

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应校长曹云祥之请,吴宓出任国学研究院主任,该院聘有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四大导师,成为清华校史之美谈。吴宓力主培养既能汇通西方文化精神,又能透彻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且能互为介绍传播创新的“博雅之士”。

1926年,吴宓又出任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教授,后又代理系主任,先后开设了《英国浪漫诗人》《古希腊罗马文学》《文学与人生》《中西诗比较》《西洋文学史》《翻译术》等课程。值得一提的是,他为清华大学外文系制定的外国语言文学系培养方案及课程设置,“使我国的外国语言文学的教学和研究走上

了全面、系统、严格、科学的道路,纠正了支离、片面、空洞、肤浅、兴趣主义和印象主义的偏差和缺点,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西方语言和文学的专门人才”。<sup>5</sup>

吴宓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和外文系的工作和教学卓有成效,有学者认为:“回顾20世纪中国学术史,人们就会发现,‘五四’以来在人文学科中最具原创能力和自立意识的那一批‘博雅之士’,有不少正是当年受惠于清华国学研究院与三四十年代清华外文系的学子,例如王力、刘盼遂、高亨、谢国桢、徐中舒、姜亮夫、陆侃如,又例如钱钟书、季羨林、李健吾、王佐良等。薪尽而火传,从这个意义上讲,吴宓的文化担当与教育理想没有落空。”<sup>6</sup>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清华大学奉命南迁,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在长沙组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吴宓也随校迁至南岳衡山,在文学院任教。不久,因战局变化,日寇攻陷南京,武汉告急,学校又迁云南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吴宓也随校来云南,在蒙自的文学院任教,讲授《欧洲文学史》等课。

从1942年起,吴宓还被教育部聘为英国文学教授和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审议委员。1944年利用休假曾至遵义浙江大学、成都燕京大学、四川大学讲学、授课。1946年出任武汉大学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

1949年,吴宓拒绝去台湾,来到重庆,相继在相辉学院、勉仁文学院、重庆大学、四川教育学院任教。1950年秋,因高校院系调整,多所高校合并,成立西南师范学院(今西南大学),吴宓先后在该院外文系、历史系、中文系任教。他之所以会辗转三系,是因历史原因而对他的不公正对待,但也证明了他古今中外皆通,文史哲皆精的深厚博大学术功底。

令人痛心的是,吴宓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所谓“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批判斗争,身心受到极大摧残,不幸于1978年1月17日去世,结束了他坎坷的一生。

<sup>4</sup> 李赋宁.北京大学李赋宁教授的讲话[R].王泉根主编.多维视野中的吴宓[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1.4.

<sup>5</sup> 吴学昭.吴宓日记整理说明[A].吴宓.吴宓日记:第1册[M].北京:三联书店,1998.1.

<sup>6</sup> 王泉根.多维视野中的吴宓·后记[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1.541.

### 二、吴宓记载辛亥革命之始末

1911年2月,吴宓来到北京,入清华学堂读书,让他没有料到的是,8个月后,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就爆发了。

吴宓自1906年(12岁)起就开始写日记,一直写到“文革”后期(由三联书店出版的《吴宓日记》及《吴宓日记·续记》收录了他1910~1974年的日记。但其中1910年前及1949年的日记皆已不存)。值得庆幸的是,吴宓自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至11月8日,清华学堂“暂行解散”离开北京为止共28天的日记却完整保存了下来。

应该强调的是,吴宓并不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生,他从少年时代起,就十分关心国家大事。如在中学读书时,因身体不好,曾作诗“队中独叹吾身弱,他日奚为军国民”,从中可知他从小就有报国大志。不仅如此,他还和其表兄写过记述日俄战争的小说,表现了他的爱国之情和对政治的兴趣。正因为如此,当辛亥革命爆发后,凭他的政治敏锐感,意识到一场关乎国家存亡的大事发生了。因此,他密切关注事件的发展变化。而北京作为清廷统治中心、全国的政治中心。武昌起义的一举一动,都在京城引起巨大震荡,都牵动着清王朝的神经。因而吴宓所记辛亥革命爆发后京城的种种反响,就更有价值。

吴宓记辛亥革命的内容来源,主要有二个渠道:第一个渠道是从当时的报纸上获取的。当辛亥革命爆发的第3天,即10月12日,他就是在“阅报”中知道了这一惊天大事的。随后的日子,他从京城各种报纸上关注辛亥革命的进程。在他的日记中,常有“今日报载”、“又据报载”、“据报章揭”、“报载长沙失守”、“报载陕中乱事”、“阅《民立报》”等等,总之,当时的报纸,是他获取消息的一大来源。虽然清廷为了掩盖真相,从10月13日起,“北京各报,已为政府禁止登载各省乱事”,<sup>7</sup>但吴宓仍从各个报纸的字里行间,找出事件进程的蛛丝马迹,记载在日记之中。第二个渠道是从消息灵通的老师、同学、朋友及才从各

省来京的人士中打探情况后,记在日记中。在他的日记里,也多次出现有“据同学辈之传言”,“国文教员杨言”,“昨日友人自北京归者,多言……”,“晨闻同学某君言”,“晨,朱君接城中信,言闻政府……”等等。虽然这些传闻传言,并不完全确实,但也并不是毫无根据,因此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当然,也有不少内容,是他亲历、目击的。

当时吴宓年仅十七岁,作为一个关心国家民族存亡的大学生,他也记下了自己对这场革命的困惑、忧虑及个人的见解,这对研究辛亥革命中知识分子的思想心态也很有价值。

### 三、记京师的震荡

武昌起义爆发,不啻一颗重磅炸弹,立即在京师炸响,引起极大震动与慌乱。吴宓在日记中,详细记载了他耳闻目睹京城的震荡与慌乱的局面。

武昌起义第5天(10月14日),他在日记中描述了京城的紧张气氛:

“日来警报纷纭,一日数起,闻之殊令人惊惶异常。现北京各报,已为政府禁止登载各省乱事,以故一切详情难得确知。惟据同学辈之传闻,则今日所闻者,事更紧急矣,云长沙、广州、南京迭遭失陷。……本校原定二十五日行开校仪式,今以外事危急,学部及外部大臣不克莅止,业已展缓期限,则其非前此之比,概可知矣。”<sup>[P161]</sup>

由此可知,武昌起义的消息在京城引起了多大慌乱,一是警报“一日数起”,“令人惊惶异常”;二是清政府深怕老百姓得知真相,为掩人耳目,命京城各报不得刊登此类消息;三是清廷官员张皇失措,连清华学校的开校仪式也无心思参加了。

到了事变第6天(10月15日),京城气氛更加紧张,清政府采取了种种措施,也无法控制社会动荡不安的局面:

“京师亦已戒严,派全优分驻各所。而市上各银行,日来迭遭倒闭。缘商民人等自闻乱事,纷纷执钞票向钱店索支现银,该银行等一时存款无多,不能应付,故有此现象。余入城时,信成银行及其他钱店门

<sup>7</sup> 吴宓,《吴宓日记:第一册》[M].北京:三联书店,1998.161。以下所引《吴宓日记》内容,均出自第一册,为简便起见,只在引文后标注页码。



辛亥革命中混乱的北京城<sup>8</sup>

口,皆有多人拥挤喧嚣。巡警群驻,力为排解保护。而虽用现银到钱店,亦不能得兑银元,经济界之恐慌盖可想见。”<sup>[P162]</sup>

这是吴宓亲眼所见当时市面的混乱状况,而清政府采取戒严、派兵把守,巡警群驻、封锁消息等举措,仍无济于事。到了事变第8天(10月17日),京城的惊恐气氛有增无减,人们的慌乱情绪已漫延至校园,吴宓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

“警报迭传,战机未决,京师人心惶惶,不知所止。本校僻处城外,消息隔阂,谣传尚少。然同学辈中心已乱,或虑家中之安危,或虑居此将来之吉凶,以故纷纷请假入城探获消息。……而同学之请假归家者或避难往津、沪者颇不乏人,而居者亦惶惶无定止,心咸思所以为计者。余则无法且不欲逃而他去,故只可静居此间,安待天命可也。”<sup>[P163]</sup>

随着清军的屡战屡败,京城更加慌乱。清廷虽然采取严密封锁消息之法来稳定人心,但也只能起一时之效应。吴宓在10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

“近日京师一切稍形镇静,缘自各报受禁令不得登载鄂事后,一切消息不易喧腾于社会间,而经济恐慌亦不如前日之甚。然北京内城各街则密置守兵,并有游巡队。政府已力为戒严。然实在消息虽不能知,而人民之惊慌夫岂可掩乎?”<sup>[P168]</sup>

果不出吴宓所料,尽管清廷采取封锁消息的办法以图安定人心,但战局变化,革命军的胜利是无法掩盖的。所以,当人们从其他渠道获知战局实况后,京城就更加慌乱了。10月27日,吴宓在日记中记述

了这一景象:

“今日风声更紧,人益惶乱。同学辈纷纷逃走回家,全校学生几去其半,上课时同班到者仅十一人。至京中现状,则闻已大有乱象。京官眷属,纷纷送之回籍。闻庆王(指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已逃走,……天津、上海诸地,人已满至再不能容。京津、京汉诸火车,拟初八日(10月19日)全行停止。”<sup>[P174]</sup>

随着革命军不断获胜的消息传来,京城的官员及不明真相的商人、学生等纷纷逃出京城。10月29日,吴宓记述了出逃京师的混乱状况:

“京官眷属业已纷送出京,其逃避出京之人,日不可以数计。城中各校学生业已尽退,几乎全空,……京津等各火车,日售票至三千余张。而以拥挤不得上车而复归者,每晨又数百人。由津至沪轮船之拥挤称是,船价确已涨至二十五元。而天津旅客客栈等处,住客已满不能容。北京亦然,租价日增。而北京市面恐慌尤达极点,汇兑亦几不通,诸人皆告窘乏。”<sup>[P177]</sup>

仅从以上记述,不能不佩服吴宓一个年仅17岁的学生,竟然对当时京城的震荡状况观察得如此全面,如此细致,记录得如此详尽。今天读其日记,也能让人感受到当时京城的惊恐混乱的气氛。

#### 四、记清廷的昏庸

自武昌起义爆发后,吴宓在日记里多处记载了清廷的惊恐、昏庸与腐败。在辛亥革命爆发前,由于西太后去世,清廷早已失去了维持统治的核心人物。当时的隆裕太后是一个眼光短浅、优柔寡断之人,而监国摄政王载沣懦弱无能,没有主见;内阁总理大臣亦劻年老昏庸;掌财政的度支部尚书载泽贪婪无厌;而掌兵权的军谘大臣载涛、毓朗,陆军部尚书荫昌等人都是些只知享乐,不懂军事,更不会指挥打仗的纨绔子弟。因此,当武昌起义后,他们惊慌失措,不知如何应对,甚至不顾大局,只知自己逃命而丑态百出。吴宓在10月15日(即武昌首义第6天)的日记中就揭露了北京城内发生经济恐慌,银行钱庄被挤兑的原因:

“京师经济界恐慌之原因,实因政府诸大老皆谋

<sup>8</sup> 图片来源: <http://www.xhgmw.org/archive-49994.shtml>。

自逃之计,庆王(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首向大清银行提出金币三十万两,他大臣亦略称是,人民见之,不知事果如何危急,纷纷效尤。而各大银行以是而皆十分空虚,故其结果遂致如是云。”<sup>[P162]</sup>

你看,吴宓一针见血指出:京城市面之所以发生经济恐慌,完全是清廷核心人物贪生怕死,只顾自己逃命,率先向银行提兑金币所致。10月16日,他在日记中再次揭露了清政府“诸大老”的昏庸无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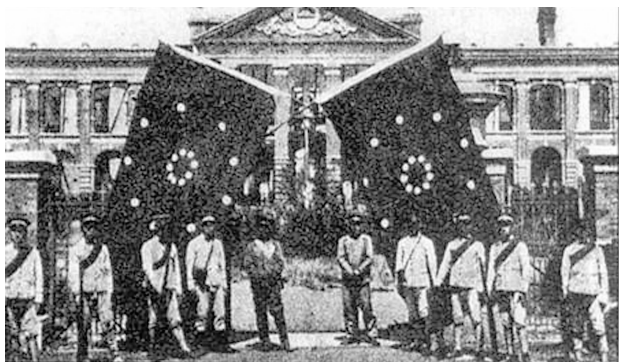
“惟政府近来焦虑异常,诸大老毫无能为,惟互相悲叹而已。荫昌(陆军部尚书)前经受命率军南下,而乃惧弗敢往。”<sup>[P162]</sup>

吴宓身在京城,竟敢指斥近在咫尺的清廷大官们贪生怕死,毫无能为,虽只是写在日记中,但仍是需要一定勇气的。吴宓还揭露了清廷“诸大老”对内采取镇压手段的凶残面目:“荫昌在京时即闻所部军士中有不欲赴敌者,遂斩二十七人以徇。”<sup>[P165]</sup>而与此同时,吴宓又揭露了“京中京官之流,多有安顿家眷预备逃走者”<sup>[P165]</sup>，“京师眷属,纷纷送之回籍。闻庆王(庆亲王奕劻)已逃走”<sup>[P174]</sup>。你看,这些京官们一方面对不愿出战的士兵斩首示众,一方面却慌忙出逃。两者对比,真是绝大讽刺。而清统治者对革命党人,更是仇恨之极,吴宓在10月30日的日记中就记载了3天前(10月28日)发生的一个传闻:“初七日晚,京师捉获革党之潜匿者二十有七人,其中四人无辫,已杀之,余二十三人则拘系也。”<sup>[P178]</sup>

清廷官吏的昏庸无能及残忍自私,只能造成“军心益懈,斗弗力,以故致败”<sup>[P165]</sup>的结果。

## 五、记自己的困惑

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普遍有着深切的民族忧患意识,这实际上也是他们爱国主义精神的反映。“位卑未敢忘忧国”,当国家处在动乱之时,他们想得多的不是个人安危,而是国家的前途和命运。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时,吴宓作为一个学生,对这场突如其来的革命完全没有精神准备,只感到国家将陷入动乱之中,前途命运未卜。因而处在极度的困惑和忧虑之中。如当他在10月12日(即辛亥革命爆



革命军占领武昌城后,军政府挂起象征十八省团结一致的十八星军旗<sup>9</sup>

发第3天)从报上得知武昌起义的消息后,又吃惊,又困惑,又担忧,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夕,阅报,则湖北武昌府方有革党举事,而防兵复变,倒戈相向,以故武昌府城已陷,瑞督(指湖广总督瑞澂——笔者)逃驻汉口,提督张彪已被捉杀。乱事方炽,正未有已,吾不知中国前途如何?果于何时灭亡也!吾辈又将如之何而可乎?”<sup>[P160]</sup>

从这天的日记可以看出,他对武昌起义毫无认识,只觉得国家将要大乱,他担忧的不是个人安危,而是国家的命运和前途,也困惑于自己以后将如何前行才对。10月13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鄂乱为势甚凶,汉阳亦已陷落。又郑州北黄河铁桥已被割断。……近日国中多事,独吾陕景象尚号太平,毫无诸种动作。呜呼!国社危灭,恐桑梓亦只燕巢幕上,庆旦夕之安而已。”<sup>[P160]</sup>

你看,吴宓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将武昌起义称为“鄂乱”,将革命军称之为“敌锋”,担心“鄂乱为势甚凶”,致使“国社危灭”,可见他对武昌起义作为一场革命行动并无认识。且随着战局的变化,吴宓的困惑与担忧也与日俱增。10月1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国危像若此,茫茫宇宙将于何处托足,未免太觉无谓也。”<sup>[P165]</sup>10月26日,当他听说自己的家乡陕西也发生响应革命之兵变后,他在日记中写道:

“今日报载陕中乱事,盖已成确举。闻系西安新军变,城门闭。城中未知如何,亦未得西安消息。但有新军中协统某,只身逃至潼关,由潼关发一电报至京。究亦未能详悉现状何若也。今日中国大乱,四海鼎沸,桑梓夫岂能独安?吾家三原,想不至有他虑

<sup>9</sup> 图片来源: <http://202.103.38.70/zt/xhgm/wuchang/wuchang.htm>。

坎。”<sup>[P173]</sup>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武昌起义爆发之初,他认为革命党人势力太弱,根本不足以与清军抗衡,所以他估计清军与革命军的较量,肯定“革党决不能获胜利”。他在10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以下凡日记中括号内的说明,均为笔者所加):

“此事(指武昌起义)成败消息现虽难定,以意度之,革党决不能获胜利,且即使如何如何,吾人岂遂必有性命之忧乎?且吾生毫未履危险,今即使京师有事,使余能于此危境中安稳渡过,则能广增闻见,多添知识,事后谈之亦津津有味,且多能掇拾轶闻琐事,为他日著书之资料,而况此种危险事,特不敢言其必无耳,非敢谓必来吾前而加诸吾身也。”<sup>[P164-165]</sup>

此时的吴宓,因认定“革党决不能获胜利”,所以竟认为根本没有必要逃出京城,他决定自己将在京师“安稳渡过”,而且还要将亲历事变经过作为以后茶余饭后的谈资或写作之资料。

但随着战局的发展,他开始明白自己太小看革命军了,后来他也意识到京城将不保,也开始作离京的准备,但哪里是安稳的落脚点?偌大的中国,哪里可安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他处在困惑之中。12月27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余终日心中忐忑,至不静适。余思,往上海之说虽善,但中国到处皆乱,辗转逃避惟觉多事,其果能幸免与否,又未可必。……人生运命之说虽不可信,余今居此弗行,将来颠沛流离未必遂死。即使事情到十分紧急地步,余能于乱中苟全性命与否,彼时一听诸天。……余素慕佛氏之说,顾尝欲学之而未得,今处此等境界,毫不知将何所措。余此时主意如此,写日记之文字如此,他年结果若何,追悔此日之失计与否,此时皆不及知。呜呼,余之心亦实苦矣!”<sup>[P174-175]</sup>

由此可知吴宓当时痛切感到“中国到处皆乱”,他为国家前途命运担忧,也为自己找不到出路而痛苦。中国知识分子深切的民族忧患意识,也在潜移默化影响着这位身陷逆境的青年。

但吴宓并不糊涂。10月30日,当学校老师谈到希望清政府通过此事件吸取教训,作适当政治改革时,他却对此表示怀疑:

“午后,监督唐(唐国安,清华学堂副监督,民国

后任清华学校校长)演说今日所下五道诏谕,言自此乱事可平,诸生在此亦无忧患矣。而国文教员杨亦言,此后政府或能稍行改良政治,革命之事或将由此而止。果政治上能得少许进步,然亦以多人之血易之而来者,实则其果能改良与否,亦未确定。”<sup>[P178]</sup>

你看,吴宓的老师把政治改革的希望寄托在清政府头上,而吴宓却表示怀疑。从这一点看,吴宓头脑还是清醒的。他对袁世凯被重新重用来对抗革命军,也有个人的看法:

“袁项城此去,各国皆翊赞之。此次至军必不开战,必与革军作和平之了结,则此次乱事以此而止。但未识革党如何对待。将来结果,或革党解散败灭,或可保有南方各省,成一完全对峙之独立国,皆未可知,但必经一番极有趣味之变动也。”<sup>[P178]</sup>

吴宓对战局的分析,虽然和以后的实际发展相去甚远,但其中也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为此,你也不能不佩服一个17岁的青年学生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心和思考。

## 六、记战局的进展

武昌起义同以往革命党人举行的起义,如镇南关起义、河口起义、广州新军起义、“三·二九”起义等等,不同之处在于,它不仅在一个省会取得胜利,而且迅即得到各省的响应,在短短的9天内,就有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5省先后宣告独立。清政府已处在风雨飘摇、土崩瓦解之中。

在《吴宓日记》中,对辛亥革命爆发后的战局进展变化特别是京城动向作了较详细的记载。尽管当时通讯较落后,战局消息往往滞后,一些传闻也不太确实,特别是武昌起义爆发后没几天,清政府惊恐万状,深怕百姓知道真相,禁止各报刊登战局消息。所以吴宓在日记中写的战局进展变化,虽然不尽准确,但毕竟是属当日的所见所闻,也十分珍贵。如10月13日,即武昌起义第4天,吴宓在日记中写下了战局进展状况:

“鄂乱为势甚凶,汉阳亦已陷落。又郑州北黄河铁桥已被割断。前日京汉火车南行只至驻马店,今则只可达彰德,弗能前进。陆军大臣荫昌率禁卫军二万

南下,乘火车行,半途而返,改由海道行,由津而沪,由沪而汉,以当敌锋。又闻京汉铁路断后,由京至陕邮信已经不通。”<sup>[P160]</sup>

当清廷决定重新启用袁世凯,而袁世凯以种种条件要挟,迟迟未动身之时,吴宓却在考虑清军与革命军在对决中,各自胜败的后果,他在10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

“缘此次袁项城(袁世凯)之行止今尚未决,革党与官军尚未开战,然过一二日自见分晓。使革党败,则官军殄之戮之指可尽,若是则京师无丝毫之危,然其所损英杰,沮伤元气,夫岂吾人之初望哉?然使革党战而获胜,则渡河而北,京师戒严。京师所需粮米咸仰给于东南,使交通断绝则京师之民米食不足,加以经济界之恐慌,势至百物昂贵,人民无业而乏食者多,而必流寇纷起,土匪之祸扰,实在吾人意计之中。”<sup>[P164]</sup>

你不能不佩服小小年纪的吴宓,竟然对双方胜败的后果有如此推测。但战局却瞬息万变。第二天,即10月19日,吴宓在日记中就记载了清廷紧急调兵遣将,运送军队军火及荫昌战败,而水师都督萨镇冰所率水师获得胜利及重新任用袁世凯等消息:

“袁世凯当即受命至军,但行动殊迟缓,且较之他人总胜一筹,将来至鄂或不至肆行杀戮也。昨夜火

车之经园(指清华园)外者终夜不绝,其行殊速,汽笛呜呜,深夜闻之令人震恐。盖又由他处运兵至京,或调往助战耳。至今午,同乡马君接北京其戚某信,言得报:荫昌遇敌于河南之武胜关,为革命军所败,现退驻郑州。京师已派兵接助。……荫昌之军固无能力,但弗知袁世凯至军时胜负则又何决?殊令人心惴惴。……今晚报纸又载湖北革党已为萨镇冰之水师所败。不知胜败之机究竟果如何。”<sup>[P165-166]</sup>

但过了二天,即10月21日,吴宓又记载了萨镇冰水师不但没有获取胜利,反而是被革命军打败的消息:

“今晨,又传萨镇冰水师为革党所败。萨军死二百人,沉兵船一艘,而革军则死三百人。此种新闻虽传闻纷纷,实难确信。盖胜败之机,非俟袁项城(即袁世凯)至军一大决战后不能定也。”<sup>[P167]</sup>

看来,包括吴宓在内,认为只有袁世凯出山,亲率大军,才有战胜革命军之希望。果然,10月23日,吴宓在日记中记载了袁世凯同意率军镇压革命军,但故意迟迟不动身,却提出了他的三个条件:

“袁项城奉谕旨后,虽允往军前,而意殊迟迟,只以集待旧幕人员为词,迟迟不发。而上书请求三事:(一)速开国会。(二)解释党禁。(三)则此次进行方针,一意主抚是也。此三者政府必不易于许从,而袁亦以是为迟缓计。盖袁此时进退维谷,处境极难。以余代为之策,则不往为善,盖此行无论胜败如何恐皆不免,何必再于今日之时代,强作第二之曾(即曾国藩)、左(即左宗棠)哉!况其事之顺逆,势之倒置,利害之大相悬殊,又有如此者乎?”<sup>[P169]</sup>

吴宓作为一个学生,竟有如此独到之见,竟认为袁世凯“不往为善”。他关注战局进展,时时记入日记中。10月22日,他记载了武昌起义后全国迅速响应的局面:

“盖近日事局益迫,此次革党举事时,曾派员至各省运动谋划,以故各省皆先后有变。除南省外,山东已曾肇事,督署被焚,但未能成功耳。即吾陕,亦未尝无事也。据报载,中秋前数日,杨抚(陕西巡抚)即知有事发生,于是西安府戒严数日。盖革党四百人由鄂入陕,谋于中秋夜举事。……现在传闻,汉中府有



民立报<sup>10</sup>

<sup>10</sup> 图片来源: <http://www.xhgmw.org/archive-49994.shtml>。

不安靖之说。而陕省与湖北界上,则已有重兵驻守。”

[P168-169]

10月24日,吴宓又在日记中记载了战局变化的消息:“报载长沙失守,或系确信。又载陕西兵变,此事余闻之固亦吃惊,然实不敢信其必然。或即有此事,亦不过营伍间有争抗之事。”<sup>[P170]</sup>也推翻了前二天他确信“陕西目前决不至有乱”<sup>[P169]</sup>的看法。

10月25日,他在日记中又记述了京师加强防御之举:“闻京师近日愈益戒严,至今日则将枪炮诸物已皆堆置城垣,大有守陴御寇之意。”<sup>[P171]</sup>10月26日又记载了一则出奇消息:“又闻吴禄贞已在军中杀死荫昌,以兵叛附革党。顾此事太似离奇,实有不可信者。”<sup>[P172]</sup>10月27日则又记载了“九江、芜湖相继失陷,荫昌生死未确,信阳州已沦于革党”<sup>[P174]</sup>的消息。10月29日,又记载了一条战局消息:

“据今日报载,荫昌获一小胜,夺回大智门车站。或谓旋仍为革军占领,或又云今日长沙已为萨镇冰所克复。要皆难信其确也。余出,即至关中会馆访叶君,……叶君告余言:闻革军已由潼关东出,分兵二路并进犯山西,以故山西南境亦不安靖。”<sup>[P177]</sup>

由于当时通讯落后,各种传闻肆虐。吴宓虽也不能辨别真伪,但都记载下来,疑者存疑,以待确证。如10月29日,他记载了北京、上海各报所刊登的大相径庭的报道后,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余今日在此得阅《民立报》,其中盛称革命不遗余力。盖北京各报极力辩护,言毫无事情,好传荫昌胜仗,实皆不可能凭信。而上海诸报则极力鼓吹,言革军之多胜利,实亦有过分语。吾辈今日处此,如在梦中,外间真确消息毫未闻知,实为不妥之至。恐形势紧急而临时尚无所知,不能预作防患之计,则诚非善也。”<sup>[P177]</sup>

虽然战局消息出之多门,互有矛盾,但他仍如实将各方消息,那怕是矛盾的消息也记载下来。如11月1日,他记了一则新闻:“近日忽喧传广东等省,业已完全宣布独立。袁项城尚未至军。又云荫昌在汉已略获胜,然山西则乱事殊烈。”<sup>[P179]</sup>11月3日又记载了一则更加惊人的消息:“晨,朱君接城中信,言闻政府有逃往关外蒙古库伦一带之议,已预备车辆八百乘以供运载,然实亦未确。”<sup>[P181]</sup>11月5日又记载了

上海被革命军攻占的消息:“晨,闻上海失陷,县城及制造局及吴淞口炮台并皆已为革党所据。”<sup>[P183]</sup>到11月6日,又记载了天津被“攻占”的消息:“夕,忽喧传天津失陷,继知尚未也,特人心大扰乱,事亦将发现于一二日内矣。”<sup>[P185]</sup>

“存疑”、“传疑”、“阙疑”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古代史学怀疑精神的重要内涵。对自己不能完全确信的事,宁可存疑、传疑,也不武断下结论。吴宓明知有些消息不尽确实,但他仍及时记在日记中,并再三声明“实亦未确”、“难信其确”等语,以备以后查考,这种“疑者存疑”的方式,正是事实求是的态度。

## 七、记对革命党人的认识

应该说,吴宓作为一个17岁的学生,虽然对国家大事十分关心,但对发动辛亥革命的革命党人却几乎没有什么认识,在日记中,他称武昌起义为“鄂乱”,并认为革命党人绝不会取得胜利。正因为如此,当同学们纷纷逃出京城之时,他却不想逃跑,他在10月18日的日记里写道:

“是时管理学生人等,咸各寻路逃生,……余现无可逃,且余思可不必逃,盖余之意殊以静居为一定之方针也。此事成败消息虽难定,以意度之,革党决不能获胜利,且即使如何如何,吾人岂遂必有性命之忧乎?”<sup>[P164]</sup>

你看,在吴宓看来,“革党决不能获胜利”,所以他开始并不打算与同学一起逃出京城。特别是他和京城上下不少人一样,把胜利之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认为只要袁世凯亲自出马督师南下,形势就会大变。他在10月16日的日记表达了这一看法:

“荫昌前经受命率军南下,而乃惧弗敢往,遂运动泽公(度支部尚书载泽)及摄政王(指醇亲王载沣)而起用袁项城(即袁世凯)代为督师,故现在胜败之机一决于袁。袁而不肯行也,则革党或能获胜;袁而竟行也,则剿灭革党直指顾问事。缘北洋新军皆袁之旧部,而袁得军心至切,军士皆乐为效死。革党则势力太微,人数殊少,范围殊狭,不能相持,其败必矣。然使袁而竟叛附以倒戈相向,部下从风,则其事又大

异矣。”<sup>[P163]</sup>

虽然他认为革命党人因“势力太微”而“其败必矣”，但他仍非常关注革命党人的一举一动，特别是革命党人让人耳目一新的动向。如他在10月15日的日记中，就记载了革命党人纪律严明的传闻：

“有于二十一日（指阴历，即阳历10月12日）自鄂归者，言十九日至二十一日（即10月10日至10月12日）武昌、汉口状态最悉，略谓革命党此次极为文明，极守秩序，商民等人毫未受及扰害云云。”<sup>[P162]</sup>

实际上，在吴宓心目中，革命党人是追求进步的党，是目标远大的党，只不过目前“势力太微”，不足与清廷对抗而已。如当他在10月22日听说自己的家乡陕西也开始有“革党举事”之后，感慨道：“陕人而有革命思想，是亦陕人之进步矣。”<sup>[P168]</sup>隔了一天，即10月24日，当他从报纸上得知“陕西兵变”，“叛而革命”之消息后，却“实弗信其确”，其原因竟是：“盖余常谓陕人今日之程度低微，尚无为革命军之资格也。”<sup>[P170]</sup>可见在吴宓看来，革命党人是追求进步的，如没有一定的思想觉悟，是没有资格当革命党人的。

随着战局的发展，吴宓对革命党人有了更深的认识。在10月23日的日记中，他发现革命党人“令人惊服”的地方：

“闻此次革党实目的远大，谋划周密，有真令人惊服者。当其初举，则遣人各省预期同发，或未能尽如所志。然今则除以其本部重军扼守武汉而外，进征之军则三道进攻：（一）溯长江而下，进窥江西，……（一）北上攻略河南，以图进取，……（一）则进窥四川及陕西南境。闻现宜昌、荆州皆已陷落。又云黄州亦失。”<sup>[P169]</sup>

你看，吴宓对革命党人“目的远大，谋划周密”有十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当他听说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的举措大得人心后，原来认为革命党人“其败必矣”的思想动摇了，他在10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

“鄂事惶惶，殊未知结果何如？但据报章揭，则革党在鄂设施制度，一切迥有规模，气象蒸蒸，方兴未艾。而政府则萎顿，一无所为。将来事局如何，实未可以预卜也。”<sup>[P171]</sup>

你瞧，才短短几天，吴宓对革命党人的认识已大有改变，从原来认定革命党人此次举事“其败必矣”到如今认为战局胜败“实未可以预卜”，特别是他在11月5日的日记中，详细记载了武汉一个13岁少年投奔革命军的故事，十分感人，也让吴宓对革命党人有了更深的认识：

“闻黎元洪在汉招兵，有一十三岁之童子前往军中投效，其母哭而送之，旁观者咸涕泣。或以其幼，劝之勿往。童厉声曰：余此行将欲尽驱胡虏，复我父祖之仇，顾可谓我幼而遂尼我行耶？意者此童之父若祖，生时必受异族之欺凌以死，童乃怀斯苦志磨励以需。其言之也痛，而其志诚壮，莫谓我族遂无人也。坐是则光复大业，其或可期。余等之碌碌无行，有愧此童多矣。然而世变未已，他日英雄俊杰之见于世者，当不以此童为止也。”<sup>[P185]</sup>

这一故事，使吴宓十分感动，也多少改变了他对革命党人的看法，甚至改变了他对这场革命胜败的看法，他已从认定革命党人“其败必矣”，变为革命党人“光复大业，其或可期”了，这是多么大的思想转变啊！

难能可贵的是，吴宓对革命党人虽然认识有限，但也有其独到之处。如10月16日，吴宓在日记中分析革命党人“势力太微”的原因就让人不得不佩服。他写道：

“余思革党势力尚微者，以弗能鼓动一般人民前冒锋镝，而仅以最少数，最有用之人才为军前之牺牲而犹患不足，非良策也。然处中国则又与俄国等异，一般人民断不得而煽惑之，故此次如又失败则损失不可亿计。”<sup>[P163]</sup>

而辛亥革命的一大特点，就是这场革命只是革命派少数精英在推动，而广大民众对这场革命茫然无知。有学者认为，辛亥革命中，“恰恰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工农群众几乎完全被排除在当时革命党人的视野以外”，“而没有广大工农群众的积极参与，革命党人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面前只能深深感到自己缺乏实力而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sup>11</sup>让人惊讶的是，吴宓当时就多少看到了这一点，实在太难得了。

<sup>11</sup> 金冲及.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174~175。

## 八、记清华学堂的艰难

武昌起义引起京城的巨大震荡，也迅速波及到了吴宓就读的清华学堂。原定10月25日举行的清华学校开校仪式也不得不“展缓期限”。而更让吴宓担心的是清华学堂的危险处境。他在10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

“清华园孤悬城外，附近尽围满人，生计维艰，倘使蜂拥而扑，则本校情势殊觉危险。”<sup>[P164]</sup>

吴宓虽年轻，但政治敏感极强，对学堂四周尽皆满族人居，他马上感到了学堂的危险处境。他又在10月26日的日记中进一步分析了这个危险性：

“盖本校之危，实属至危至险之境，无论荫昌生否，军中消息何若，吾辈现所虑者，厥有二事：（一）为土匪，恐消息紧急时纵起剽掠，本园孤悬城外，其危可知。（二）为满人围本校而居之，乡人皆系满族，当此革命蜂起，排满议兴，彼满人之嫉视汉人自意中事（闻前日禁卫军中皆系满兵，有人倡议欲戮汉人，而先从无辩之学生下手，闻管理官所止，始克无事）。<sup>12</sup>如果事局一危，乃以诛戮汉人为暂快。目前之计，此清华园中人其得生乎？况军书一紧，本校粮绝，诸生经费缺乏，无所得食，则更事之显而易见者也。”<sup>[P172]</sup>

面对如此危险环境，吴宓竟然提出了一个防范之法，可知他并非是一个只知死读书的书生。他在10月26日的日记中记述了他的“防祸”之“策”：

“祸患之来，实意中必然之事。而诸生防祸惟有一策，如能由管理人倡导主持公同保御之法，与诸生约毋得他逃，咸可留此，每人给枪一支，练习行军并厚储粮米。即使一有他变，以本校五百余人保护本园，抵御土匪，则亦有余力矣。”<sup>[P172]</sup>

然而吴宓也深知这一建议虽然有道理，但真正实行起来却困难极大，他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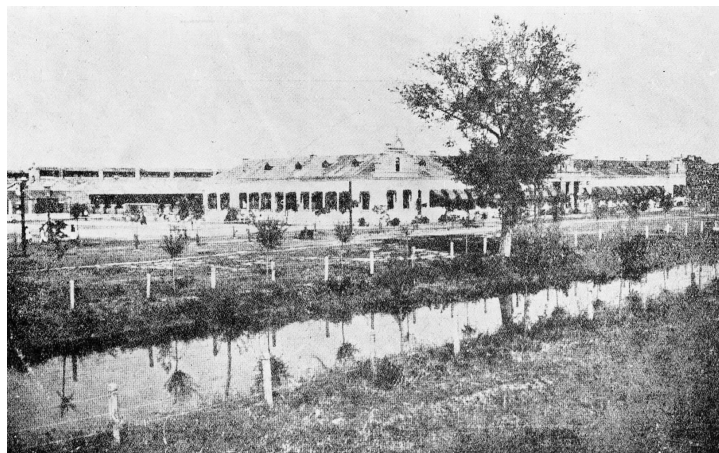
“但管理人决不为此，而诸生他逃者多。且此诸日中，城内皆派有侦探，密来调查学生

中无革命情迹。而本园巡警皆系满人，其驻守此间，实非为卫学生，而为防学生计也。今若如是预备，则岂有不指为谋逆者乎？故此事之不行，亦弗能责之管理人，而公共保卫之策决乎有不能行者矣。以故，诸同学除分散逃避外，更无别法。否则居此，束手以待毙矣。”<sup>[P172-173]</sup>

由于清华学堂是1911年清政府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办的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因而与美国关系特殊，因此，又把保护学校及师生的希望寄托在美国人身上。吴宓在10月28日的日记中记录了他及同学们的这一想法：

“盖同学皆希望此校美国有特别关系，故如一有事时，外国教员又尚居此园中，则临时美国使馆当派兵来守护此地，或即将诸美国教员迁入城中使馆，而留此之少数学生或可一并迁往。”<sup>[P176]</sup>

而京师其他各校也基本如此，师生皆有逃出京城以避难。10月29日，吴宓在日记中记载“城中各校学生业已尽退，几乎全空，而仍上课维持如故”。<sup>[P177]</sup>11月2日，吴宓又记本校学生离京情况：“此诸日中，学生日日有去校者。余同级现尚存十人，而上课时往往只得七八人。盖有若干学生自己亦不作逃计，乃留此亦不为学，徒自纷扰，究亦何益？而他级学生尤甚。”<sup>[P181]</sup>而过了几天，果不出吴宓所预料，把保护学校的希望寄托于美国使馆也已落空。11月8日，吴宓记录了这一情况，并决定第二天离京赴上海暂



清华学校中等科教学大楼<sup>13</sup>

<sup>12</sup> 此括号内文字为《吴宓日记》中的原文，非笔者所加。

<sup>13</sup> 《吴宓诗集》卷二插图。

避:

“晨,闻天津已陷,并闻北京非常惶惑。革军已有照会各国使馆,言令于五日内,将一切预备停妥。五日后,即进兵来攻北京矣。乃美国公使又函致本校诸美国教员,谓事变紧急,使馆兵数不多,似难分力守护此园,以故美国教员中多有搬出者。据此则美兵保护一层已决不可恃。吾辈居此奚所为计?于是纷思逃走。”<sup>[P186]</sup>

由于美国使馆已明确表示无力护卫清华园,不但师生纷纷决定逃出京城,连清华学堂的监督也不得不宣告清华学堂“暂行解散”。吴宓在11月8日的日记中记载了“解散”过程:

“晚八时,监督使代表向余等发表:言事情紧急,美兵既不来保护,则实无法维持。故现定办法,将本学堂暂行解散。现仅馀存款三千金,当分给诸生作旅费各谋他适,计每人可得二十元,明晨给发。凡职员、学生人等,统即于明晨搬出云云。”<sup>[P187]</sup>

第二天,吴宓就与浙江籍同学陈达等人离开清华园,由京乘火车至天津,然后搭海轮赴上海,暂住其姑丈陈伯澜家。离开清华园时,气氛凄凉。他在这一天日记中写道:“回顾清华园风物,怆然欲涕,未审他年得一重睹此景否耶?”<sup>[P187]</sup>而实际上,第二年5月,清华学堂复学,他又回到了清华园。

## 九、结语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统治中国二千余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开启了民族的觉醒和民主的精神,是20世纪中华民族的第一次腾飞。从这一点说,辛亥革命有其成功的一面;但不能不说,这场革命并没有从根本上摧毁封建势力对中国的统治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外侮日逼,军阀混战,国无宁日,人民蒙难,……中国依然处在黑暗、贫穷、落后、分裂、混乱之中,从这一点说,辛亥革命又有其失败的一面。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一场为国家独立、民族振兴而奋斗、探索的伟大实践,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某种意义上说,吴宓是幸运的,因为在他人生

开始之时,就不期而遇迎来了一场巨大的革命风暴。而这场革命使年轻的吴宓经受了人生第一场政治洗礼,逼使他从“象牙塔”走下来,第一次把眼光从书本转向了更开阔的世界。从他的日记中,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他第一次亲身体验到政治的严酷、社会的动荡、人民的疾苦,也深切感受到这场革命对他思想上的震撼。这是他人生中难得的经历。诚如他在辛亥革命爆发半个月后所说:

“能经此一番离奇变迁,目睹而心识之,亦人生不可多得之幸事也。……吾尝读历史及诸种小说,至末世乱离之际,戎马倥偬,颠沛流荡,则谓人之生彼时者,不知其心境如何!今乃亲得闻之,吾他日或亦目睹而身受之乎?他年结果,此时殊难见端倪也。”<sup>[P172-173]</sup>

他甚至认为这样的经历,对他的一生都有好处:“经此一番颠沛,益我正复不浅”<sup>[P174]</sup>。对于一个年仅17岁的青年,吴宓对能够亲历这场革命竟有如此感悟,实属难能可贵,这大约也是他为什么要在日记中详细记载这场革命的动力和原因吧。我们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当时对辛亥革命的认识是比较模糊的。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吴宓在撰写《吴宓自编年谱》(1894—1925)时,也承认“宓当时对革命事业,既未参加,且甚不赞成”<sup>14</sup>。但作为一直生活在校园里的大学生,是不能苛求的。但他的忧国忧民之心,却是十分鲜明的,是值得肯定的。

《吴宓日记》10册1998年由三联书店出版,《吴宓日记·续编》10册2006年由三联书店出版。在此之前,几乎没有几个人看过他的日记手稿,因此可以说,他对辛亥革命的记载,也才公诸于世不过十几年,应属新发现的有关辛亥革命的珍贵史料,值得学界同仁更进一步深入研究,本文只不过是抛砖引玉而已。

(责任编辑 王 智)

<sup>14</sup> 吴宓.吴宓自编年谱[M].三联书店,1998.108.

**编者按：**他是一个无私无畏求真索源的化学家，也是一个智勇兼具纵横商界的企业家。他志存高远，33岁就当上了董事长。他让智慧碰撞，几十年来不断的追求着科学的真、道德的美，他就是西南师范大学化学系77级学生、现清华紫光英力公司董事长尹应武。

# 托起高科技 英力创奇迹

——记清华紫光英力公司董事长尹应武

□文/周鸣鸣

1995年12月25日，清华大学紫光大楼张灯结彩，热闹非凡。国家经贸委、国家教委、化工部、中国专利局等单位的领导们，中科院、清华大学的院士、教授、博士们，来自各地的高校、企业、工厂的领导、来宾们，以及各新闻媒体的记者们汇聚一堂，正在热烈庆祝清华紫光英力化工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开业典礼。

在热烈的掌声中，英力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尹应武博士走上台来，接受大家的祝贺。第一次见到他的人，有些意外和惊讶，想不到他是那么年轻。是的，当时他才33岁，博士生毕业才一年多，然而他竟在首都北京，在著名的清华大学，创建了这个集产、学、研为一体的新型高科技企业，而且已取得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

尹应武曾是西南师大化学系77级的学生，1982年毕业后又留校任教三年。虽然自1985年他考上了

中国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而离开了西南师大，但是他始终没有忘记母校。早在1995年5月，他作为清华紫光(集团)<sup>1</sup>应用有机化学部负责人，就在西南师大创办了有机化工部西南分部。他还让西南师大成为英力公司的四大股东之一，并在化学化工学院投资装备了实验室，把西南师大作为公司“技术开发的主体之一”和“人才资源储备库”。1997年英力公司



尹应武教授开展讲座<sup>2</sup>

<sup>1</sup> 清华紫光(集团)是国家520户重点企业、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国家863计划成果产业化基地、全国电子信息“百强”企业，曾荣获国家技术发明奖、创新奖以及名牌产品等上百项奖励。

<sup>2</sup> 图片来源：西南大学校友会校友活动栏目之西南大学“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活动”之校友报告会尹应武校友回校讲学，<http://xyb.swu.edu.cn/xyb/index.php?module=notice&id=191>。

## 校友天地

又为化学化工学院的优秀学生设立了“英力奖学金”，还为化学化工学院的环境美化捐款数万，修建了著名化学家道尔顿雕像。英力公司与西南师大的密切合作，正体现了尹应武深深的母校情结。

### 二

1962年3月，尹应武出生在云南省松桂县一个偏僻乡镇的教师家庭里，贫苦的家庭使他懂得生活的艰辛，懂得读书的不易。因此，当他1977年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大学生考上了西南师范大学化学系后，他十分珍惜大学四年的学习机会，成绩一直名列前茅。1982年，他大学毕业后，以优异的学习成绩和良好品行而被留校，从事有机化学的教学和科研。

1985年，他考上了中国科技大学近代化学系硕士研究生，来到了合肥。十分幸运的是，他的指导教师是国内外知名的专家赵玉芬<sup>3</sup>教授和张保忠<sup>4</sup>教授。在赵玉芬、张保忠两位教师的悉心指导下，尹应武的专业水平大有长进，完成了高质量的硕士论文《磷酸化氨基酸的合成及结构与反应性研究》，这项成果获得了中科院自然科学三等奖。

1988年夏，尹应武硕士研究生毕业了，按照他的学习成绩，是完全可以留校任教或到研究所搞科研工作，甚至可以到海外去发展。然而他却选择了“下海”。他认为当前能为国家经济发展直接做贡献的科研人员比例实在太少了，而利用高科技为国家经济发展出力，则更是国家的急需，更能体现人生价值。因此，他毅然来到了北京，到北京兴大科学系统公司出任副总工程师和科研部经理，从事技术开发和技术转让工作。

在兴大公司，他主持佳乐麝香和大环麝香的合成工艺研究，获得了许多突破性的成果，特别是在革新了大环麝香的生产工艺，开发了佳乐麝香、麝香—T



演讲中的尹应武<sup>5</sup>

新产品，发明了解聚催化剂“YCA”，研制了相应的工艺设备，指导建成了投资150万元的合成麝香实验中试基地，从而大大改进了合成工艺，提高了质量，降低了成本。这一项目不仅获得了北京市国际博览会金奖和国家火炬计划优秀项目奖，而且已实施了3家企业技术转让，公司获利近百万元，而厂家获利在千万元以上，产品已打入国际市场。

以后，他又参与了抗癌新药“安托可金”及 $K_{4-1}$ 的研制。此药经北京肿瘤医院等国内有关单位初步临床证明，具有无毒、广谱、镇痛及见效快的特点，是国家经贸委重点支持的十大项目之一，得到了国家近两千万元的拨款，并已创造了近千万元的效益，这个项目已获得了国家专利，并申请了世界专利，不久将获得一类新药批号。尹应武是第三主要发明人。

### 三

这些年来，尹应武获得各种科研成果、各种发明专利和各种奖项，数不胜数。早在1988年，即他在中国科技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时，他主研的科研项目

<sup>3</sup> 赵玉芬(1948年-)，河南淇县人。1971年毕业于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化学系。先后任清华大学教授、厦门大学教授、郑州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有机化学家，兼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青年联合会委员等。2006年6月赵玉芬教授任厦门大学药理学系主任。

<sup>4</sup> 张保中(1965年-)，1987年获东医科大学学士学位，1990年获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硕士学位曾任长沙电力学院财经系教授，华天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部经理、总会计师，2006年8月任湖南晟通科技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sup>5</sup> 图片来源：新浪网财经纵横栏目之“清华集团英力集团董事长尹应武教授”(<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40523/1559773899.shtml>)。



荣获北京市优秀青年企业家金奖的尹应武(右二)高举奖杯<sup>6</sup>

《磷酰化氨基酸的合成及结构与反应性研究》(第二完成人)就获得中科院自然科学三等奖。1994年他获清华大学博士学位。第二年,他主研的科研项目《磷酰化氨基酸、小肽的合成及机理研究与波谱的应用》(第二完成人)又获国家教科委科技进步一等奖。1996年,他主研的科研项目《正负离子 FAB—MS 鉴定磷酰化氨基酸、小肽及其混合物的方法》(第二完成人)获国家科委科技进步二等奖。特别是他的《氧乐果生产新工艺》获 97 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96 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96 重庆市科技进步二等奖、96 北京国际发明展金奖。《有机磷废水有用物萃取回收预处理技术》获 96 北京市科技进步三等奖、96 北京国际发明展金奖。《OGP 系列高效相转移催化剂》获 96 北京国际发明展金奖。自 1993 年以来,他已有 20 项技术成果申请了国家发明专利,其中已有 5 项获得专利证书。主持开发的五项成果通过省部级鉴定,获得专家好评。

这些年来,他在国内外知名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共 26 篇。属第一作者的 10 篇,第二作者的 11 篇,第三作者的 4 篇。其中,在《Tetrahedron Letters》《Phosphorus and Sulfur》《Organic Mass Spectrometry》等国外知名杂志上发表论文 14 篇;属国内核心

刊物的论文有 10 篇;属 SCI<sup>7</sup>、ISR<sup>8</sup>、ISTP<sup>9</sup>、EI 的论文有 17 篇,在国际国内学术会议上发表学术论文 15 篇。

这些年来,尹应武除担任英力公司董事长兼总工程师外,还担任清华大学化学、化工、环保、热能、材料工程硕士和博士导师,被聘为清华大学国家教委生命有机磷重点实验室客座研究员,西南师范大学特聘他为兼职教授。1999 年,他被选为北京市海淀区的政协委员。他和英力公司的成就,被《中国青年报》《中国化工报》《科技日报》《经济日报》《北京科技报》以及四川电视台、重庆电视台等多家媒体报道,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他本人的事迹,已收录入《世界优秀专家人才名典》之中。

#### 四

“下海”三年,尹应武虽然得到了不少在学校和实验室里得不到的实践经验,也大大提高了适应社会的能力,他更深感专业知识的不足,他还想继续深造。1991 年,他如愿以偿,考上了清华大学化学系博士研究生。十分幸运的是,他的指导老师,也是他在中国科技大学攻读硕士的导师,我国著名有机磷专家赵玉芬院士。常言道,名师出高徒。在赵玉芬的指导下,尹应武在有机磷化学的研究上取得了多项专家们认为属国际领先水平的创新成果,获得 1994 年的华罗庚奖和 1991 年的全国每年仅 10 名的中国化学会青年奖。

#### 五

1994 年,尹应武获得了博士学位,他又一次选择了“下海”,进入了机制灵活、重视人才、重视新技术、新产品开发的清华大学紫光(集团)总公司。

<sup>6</sup> 图片来源:清华紫光英力公司官网之尹应武董事当选 2006 年“北京青年榜样”,<http://www.insight.net.cn/asp-bin/gb/?page=8&class=36&id=173>。

<sup>7</sup> 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 SCI)是由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ISI)1961 年创办出版的引文数据库。

<sup>8</sup> IRS:信息搜索排名(Information Search Ranking),为近年来较为流行的网络营销方式,主要的目的是增加特定公司的相关信息的曝光率以增加公司业务信息的能见度,进而增加销售的机会。

<sup>9</sup> ISTP:《科技会议录索引》(Index to Scientific & Technical Proceedings 简称 ISTP)创刊于 1978 年,由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编辑。



企业家尹应武<sup>10</sup>

他之所以如此选择,是有他自己的想法的。这些年,科技与经济脱节,科研成果转化难,已成为严重制约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大问题。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每年新登记的省部级科研新成果上万项,但真正向产业转化,在生产中推广应用的还不到20%。因此,如何发挥自己的特长,如何使科技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直接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是他选择“下海”,以体现人生价值的主要原因。

尹应武不仅聪慧过人,而且有创新精神。英力公司一成立,尹应武就把公司定位为一个集产、学、研一体的新型高科技公司,又把主要任务定位为致力于国有大中型企业技术改造,深入生产第一线,帮助企业解决生产中存在的技术问题,实现科学技术向生产力的迅速转化。因此,他把英力公司作为“一所‘企业医院’,为企业‘诊脉’、‘治病’,帮助企业练好‘内功’,当好厂长经理们的技术参谋,提高企业经济增长的质量,促进企业管理改革和提高企业员工素质,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另外,尹应武又把英力公司“办成一所‘技术银行’,不断的储存人才技术和信息资源,不断为企业提供不收本金的‘低息贷款’技术”。

然而,英力公司进行新科技成果和新技术的开发转让,也并非一件易事。因为这种开发和转让具有一定风险。因而,不少大中型企业的领导,由于观念上的问题和体制上的限制,往往对吸收科技成果,采

用新技术热情不高。尹应武也常常慨叹:“许多企业家往往热衷于置办固定资产,他们可以投资数百万元添置厂房设备,却不肯花几万元或几十万元钱购买可能为企业带来很大效益的技术或对人才的投资。”特别是一些企业家对技术投资市场的风险畏首畏尾,难下决心。针对这种情况,尹应武在开发转让时,根据不同的企业不同情况及其经济能力大小,因地制宜地实施改造。如在签订合同前先到企业现场调查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技改方案,签订合同后半个月之内到现场实施,尽可能边改造边生产,基本做到对生产不造成影响。而转让费则与新增效益挂钩,不搞一刀切,可以在完成验收后一次结算,也可以长期分成,还可以多次验收。对最初收取的少量预付款,如效果未达到合同规定的指标或造成损失则退款和赔偿。这些办法受到工厂企业的欢迎,从而大大促进了技术开发和转让。

## 六

英力公司创业伊始,尹应武就确立了以人为本的企业管理思想,强调在企业内部要尊重人,关心人,扩大民主参与决策等,提出了“汇聚四方英才,激发个人潜力,提倡协作精神,发挥群体优势”的人才战略和“用其所长,避其所短,充分信任,提供舞台”的用人原则。这些年来,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英力汇集了大批胸怀大志,具有真才实学的优秀博士、硕士、学士和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技术、管理人才。

这些年来,英力公司在新技术开发和转让上之所以取得丰硕成果,正是因为尹应武在公司里建立了一整套责、权、利明晰,风险共担,成果共享、团结协作,能充分调动全体员工主观能动性的管理机制。

更重要的是,尹应武以人为本的企业管理是以企业精神为导向,他让每一个英力人都懂得,个人价值的体现不仅是物质利益的获得,更重要的是要与国家民族利益联系在一起,使每一个英力人在工作中都有一种使命感和成就感的驱动。英力公司还制定了“尊重、宽厚、信实、勤政、慈惠”的行为准则。尹

<sup>10</sup> 图片来源:西南大学校友工作办公室校友风采栏目之尹应武, <http://xyb.swu.edu.cn/xiaoyouhui/shownews.php?ID=77>。

尹应武回母校西南大学参加活动<sup>11</sup>

应武还把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的“善和”有机地运用到以人为本的企业管理中，使现代管理体制与良好的人际关系揉合起来。在这种既有激励与实惠，又有成就与荣誉的机制下，英力人都能勤奋工作，尽职尽责。

## 七

尹应武是创业的成功者，他创办的英力公司也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国家产学研办公室副主任杨东占说：“科学技术的转让必须要有一个好的机制，好的模式，好的合作方式……在这方面英力公司探索了一个新路子……我认为英力公司的模式也就是高等学校科技工作同企业技术进一步有机结合的一个最佳模式。”尹应武的导师赵玉芬不无自豪的赞扬他的得意弟子：“尹应武博士所走的成功之路，也为我国高科技人才及我们的学生在走出学校的时候应该

选择什么样的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出国，留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是一种选择，但我认为尹应武博士走的这条路更有意义，更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我国如果有更多的高科技人才敢于走这样的路，中国科学进步和经济发展就大有希望。”这是对尹应武成功之路的最恰当的评价。

后记：本文选自2000年出版的《缙云山下一支歌》。十年前尹应武是人们公认的“有为青年”，十年后他是人们惊美的成功人士。他身兼清华大学教授、学者、英力公司董事长三职，近十年来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和技术转化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开发了一系列绿色化学工艺和工程技术，形成了百余项产业化成果，他创立的“英力模式”在中关村企业中更是备受推崇。

(责任编辑 熊晓汶)

<sup>11</sup> 图片来源：共青团西南大学委员会网，<http://gqt.swu.edu.cn/gqt/>。

# 教工浴室

□ / 口述 任一川<sup>1</sup> 刘懋德<sup>2</sup> 编辑整理 郭兰

**编者按：**今天，洗澡不再是一个困扰人的问题。学校附近不仅有各种洗浴中心，而且还有大大小小的温泉。人们去那些地方洗澡已不再是单纯的清洁身体，更多的是为了休闲和养生。但在上个世纪50年代，西南师范学院刚刚成立的时候，学校连澡堂都没有，直到1953年才开始修建。那时的澡堂不仅设施简单，环境简陋，而且只在周末才开放。现在的学生们大多没有那种一群人赤诚相对，谈笑风生的记忆了。用手舀起一瓢水从头顶浇过，摇摇头，那种苦中作乐的享受已离大家相去甚远。贫困有时候不是磨难，它更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 结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沿着西南大学禾丰楼正对着的斜坡一直往下，走到拐弯处，可以看见一家名为“彩霞电脑中心”的打印店，其旁边有一排砖木混合结构的平房建筑，这就是西南师范学院最早的教工浴室。

1953年学校与重庆市人民政府建筑工程局北碚工程处签订合同，由地方国营北碚设计公司负责设计修建教工浴室。浴室总面积675平方米，内部设

有大厅、售票处、走廊、盆堂管理处、盆浴室、盆浴洗脸室、大池淋浴更衣室、大池、淋浴、锅炉间及烧水房、游泳池更衣室、整容室、女小便间、男小便间、储藏室、大池洗脸间<sup>3</sup>，真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教工浴室于1953年8月31日正式动工开始修建，工匠们热火朝天地干了90天，终于完工。<sup>4</sup>1954至1955年由地方国营水电安装公司负责，分别进行了浴室的用水、用电设备安装<sup>5</sup>，大约在1956年教工浴室才正式投入使用。

<sup>1</sup> 任一川，男，河北沧县人。1985年至2009年在西南师范大学、西南大学后勤集团（原总务处）运输科工作，2009年7月退休。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3-TX0603-014。

<sup>2</sup> 刘懋德，男，河南镇平人。1953年参加工作，先后在西南师范学院工农速成中学总务处卫生室、人事处、膳食科机关食堂、基建科、卫生科，西南师范大学膳食科、运输科工作，1997年退休。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3-TX0607-138。

<sup>3</sup> 四新村浴室施工文件及施工图。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1-JJ12-28。

<sup>4</sup> 四新村浴室施工文件及施工图。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1-JJ12-28。

<sup>5</sup> 四新村浴室施工文件及施工图。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1-JJ12-28。



寂寥屋顶上的鸽子们是否知道这里曾经的喧嚣<sup>6</sup>

## 功能——洗澡堂兼理发店

教工浴室遵循着男左女右的惯例，左边为男澡堂，右边为女澡堂。男女澡堂各有八间独立的小间，里面四间是盆浴室，安装有浴缸，外面四间是淋浴间。那个时候，浴室只有周末才开放，而且限制了淋浴和在浴缸里泡澡的时间，一次不能超过半小时。大池的位置紧挨着锅炉房，虽然已经修建好，但是因为锅炉房很窄，就把一些工具及燃料堆放在大池里，所以大池就没有使用。20世纪60年代初，锅炉房被迁走，原锅炉房的位置则改成了大池。大池里备有两个大木桶和一些水瓢，木桶里装满了热水，自己只需在家里带个小桶，把热水从大木桶舀到自己带的桶里，再兑些凉水就可以洗了，洗澡时间也没有限制。一般只有男性才在大池里洗，而女性还是在原来的淋浴间或盆浴室里洗。

为了方便教职工修剪头发，学校在教工浴室的售票处专门设置了一个理发店，并在校外聘请了一位黄姓师傅理发。理发店设施简单，无非是一桌一椅一面镜子和一些简单的理发工具，价钱也很便宜。教职工洗完澡就可以直接在浴室门口的理发店修剪头发，非常方便，因此在这里理发的人也比较多。理发店每年要把收入的一部分交到学校总务科，作为管理费。黄师傅一直做到20世纪70年代末，之后又陆续换成了其他的理发师，直到教工浴室停用，理发店

才不再营业。

## 洗澡费用——价格变迁

教工浴室起初只有学校的教授及其家人凭票才能使用，票由事务科统一发放，一家人一个月大概有15张，票钱直接从工资里扣除。教工浴室的票价随着季节的变化有所改变，但一般大池的价格是8分钱一次，而淋浴为1角5分钱一次。

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后，学校停课闹革命，大约1966年8月，教工浴室也暂停使用。1970年哈尔滨工业大学迁至西南师范学院，而西南师范学院则被迫迁往梁平、忠县，学校把现西师街的位置划给“留守组”（成员为西南师范学院部分教师及教职工的家属）居住，其余的房子则交给哈尔滨工业大学使用。哈尔滨工业大学迁来后，教工浴室被再度利用起来。这一时期的教工浴室主要是对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教职工及留守组开放，票价涨到2角钱一次，也不再统一发票，而是直接交钱买票。文化大革命后期，教工浴室逐渐向学生开放。

20世纪70、80年代，随着物价的上涨，教工浴室的票价已经涨到3角钱一次。随着教师住宿环境逐步改善，去教工浴室洗澡的教职工越来越少了，但还是由学校干部培训学院的学员及学生在那里洗。到了90年代初学校修建了新的学生澡堂，教工浴室便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现在的教工浴室被隔成很多小房间，成为后勤集团临时工人的宿舍。

后记：冬去春来，转眼间几十载光阴倏忽而过，回望过去的那一段苦难岁月，如此淳朴真挚，竟是人如此怀念和留恋。生活总是向前的，教工浴室虽然房子还在，但其内在的附加值早已湮灭，只是剩下老职工的凭吊与回忆，几分钱到几角钱的澡票，一屋子人边洗边说着家长里短，道着街谈巷议的情景，以及浴室里哗啦啦洗澡的水声，无不传递着内心的安宁与平和。我们记录这些过往，是为了珍惜今天的美好生活。活在当下，希望能从禾丰楼下面的那一排排旧建筑里领悟些宁静和满足。

（责任编辑 孙玉侠）

<sup>6</sup> 图片来源：《西南大学部分老建筑及景观图谱》。

# 西南农学院的 群众性体育运动

□整理编辑/王 贤 牟乔雅

**编者按：**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非常重视人民体质健康。1953年，毛泽东提出把“三好”作为青年团工作的方向，其中又把“身体好”放在首位；1954年，国家体委等单位要求在全国中等以上学校中推行“准备劳动与卫国”的体育制度。西南农学院积极响应号召，在全院掀起了群众性体育运动的热潮。

西南农学院历来重视学生体育活动。1954年5月4日，国家体委等六单位联合发出了《关于在中等以上学校中开展群众性体育运动的联合指示》，要求在全国中等以上学校中又准备、有计划地推行“准备劳动与卫国”的体育制度（简称“劳卫制”），并选择条件较好的学校重点试行“劳卫制”。学院从1954年至1955年第一学期便开始积极推行“劳卫制”。教职工坚持做工间操，学生积极参加器械、球类、田径等体育项目，这些活动增强了师生体质、培养了他们顽强的意志。



西南农学院党委书记李兰（前一）带头做广播体操<sup>1</sup>

<sup>1</sup>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SX12-1。



1954年,西南农学院师生积极参加锻炼<sup>2</sup>



1960年,西南农学院机关干部做工间操<sup>3</sup>

西南农学院开展的体育运动中尤以球类活动最为活跃。截止1955年全院成立了9个球队,无论酷暑寒冬,队员们每天都以饱满的热情坚持晨练,课后进行日常球技训练。学院经常组织球队参加各种形式的比赛,队员们在比赛中顽强拼搏,赛出了风格、赛出了水平。

学院男女排球队多次获得四川省、重庆市、北碚区等地大型排球联赛和大学生“三好杯”排球赛冠军。



1956年,四川省排球冠军奖章



1958年,西南农学院男子排球队获重庆市联赛冠军<sup>4</sup>

<sup>2</sup>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SX12-0。

<sup>3</sup>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SX12-0。

<sup>4</sup>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SX12-1。



1959年春,院女子排球队参加重庆市比赛后合影<sup>5</sup>



1955年,全国大·中城市分区排球锦标赛奖章



1956年,全国排球锦标赛第四名奖章



1956年,徐少华(右)和傅幼英(左)参加决赛后在西湖三潭映月堤上合影<sup>6</sup>



1958年,西南农学院女篮荣获重庆市篮球锦标赛冠军纪念<sup>7</sup>

学院篮球队的成绩也不错,尤以女篮更佳,她们曾于1956-1958年蝉联重庆市冠军。

学院足球队也为西南区足球代表队输送了两名队员参加全国足球比赛。

这些亲身经历者如今多数已过花甲之年,但对这次群众性的体育运动他们却记忆深刻。当我们问起这段历史时,他们自豪地说:“我们能有现在的成就和身体与当年的群众性体育运动有很大的关系。”

(本文资料来自徐正华、宋琪、林元吉老师,他们分别是当年的女排、女篮、男排队员。)

(责任编辑 张晓华)

<sup>5</sup>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SX12-0。

<sup>6</sup>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SX12-0。

<sup>7</sup> 西南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02-SX12-1。

# 徐无闻为“鼠年”纪念章题字



□文/邓力

1996年,是农历的鼠年,喜欢生肖纪念章的人们在渴盼中等来了由上海造币厂制作的生肖贺年纪念章。

“鼠年”纪念章依循旧例,正面为生肖形象,背面以书法作品“鼠年”为主要元素。“鼠年”二字为小篆,线条遒劲挺拔,构架筋强骨健,结构沉稳端庄。书写者在形体、笔划的处理上别具匠心,通过有意识地延长垂脚,使重心上移,自然形成上密下疏的布局。这一字体在金属质的纪念章上,尽显稳健悠长之美,给人以宁静安详的感受。“鼠年”右侧署名“徐无闻”。人们在欣赏这一书法佳作的时候,更加激起对徐无闻先生的思念。

徐无闻,名永年,30岁时因耳疾失聪,故自号无闻。徐无闻先生是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唐宋文学专业、书法篆刻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国学大师启

功先生曾在《光明日报》上撰文,称徐无闻先生“博通训诂及金石文字之学”,“于古文字之考辨,造诣尤邃,暇则挥毫作书,古、篆、楷、行,罔不精工。”尤其是中山王器字,“风神韵度之清超挺质,书坛亦无出其右者”,中国书协副主席何应辉的评语代表了这一字体的最高水平。作为有重要影响的书坛大家,徐无闻先生的书法作品广受海内外人士喜爱,不少名山大川、重要的艺术场馆都留下了他的墨迹。

上海造币厂的生肖纪念章做工精细、意味深长,在立意、构形、镂空等方面都十分考究,纪念章上的文字也一定是由书法名家题写。1992年,上海造币厂慕名找到徐无闻先生,以书写“鼠年”二字相托,徐先生为“鼠年”纪念章题字不久,即染沉疴,次年逝世。4年后,“鼠年”纪念章问世,惜乎无闻先生已经无缘见到自己的墨迹出现在纪念章上了。



1996年上海造币厂制作的生肖贺年纪念章



# 论大学校史编纂的困惑与路径

□文/王列平<sup>1</sup>

中国有盛世修史、懿年纂志的传统,其目的在于“颂德、资政、育人、存史”。随着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各高校掀起了编纂校史的风潮,或彰显文化积淀,或昭示办学其志,或用之庆典扬名。总而言之,编纂校史从研究中国高等教育、大学文化、学术思想、学人大师的视角来看,既丰富了研究内容,又对史学家不愿涉及的研究窄门有所完善。大学校园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用某种形式将教育精神、文化思想、学术理念凝聚起来的社会场所,因而编纂校史就不是简单的档案材料汇集。由于近几年来笔者参与校史的研究,接触了一批高校校史,在认真拜读之后感觉到,这些校史在编纂过程中普遍存在着几个共性问题,因而极大地影响了编纂的质量和可读性。鉴于此,笔者略陈己见,希望能对高校校史的编纂工作有所助益。

## 大学校史编纂的问题所在

对于一些高校校史,笔者是怀着极大兴趣去阅读的,但阅后往往令人十分失望:既无法享受新鲜、

有趣、汲取知识的感受,也无从留下记忆深刻的烙印,获得的却是没有激情,没有活力,千篇一律,索然寡味,无可奈何的郁闷心情。

笔者对中国高等学府,始终是怀着崇敬的心情。这不仅仅因为高等学府是传播民主科学的发源地,具有浓郁的人文氛围,集聚着一批时代的精英,为国家和民族培养了千百万栋梁之才,更因为笔者人生中其绝大部分时间是在校园里渡过的。这里有恬静蓬勃的校园环境,散发浓郁的人文氛围,张弛有度的生活节奏。总而言之,校园的一切早已融化在血液之中。所以,笔者十分希望读到一本,既能新鲜活泼地反映学校的发展历史与厚重的精神文化,又能充分展现大学人的铮铮风骨和高尚气节,并运用独特的办学理念,从而达到“以史言志”培育英才,熔铸民族之魂。但很遗憾,直到目前为止,未能拜读到一本有兴趣再次翻阅的校史。

从所接触的这些高校校史看,不管是理工科院校还是人文社科院校,其内容几乎大同小异,不仅写作手法模式高度一致,甚至就连文字的叙述也如出

<sup>1</sup>王列平,男,吉林东丰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档案馆、校史馆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中国文化史。

一辙。从全书的构架看,不外乎涵概了对历史时期各项工作的汇报、总结(图表及数据统计),并以时代特征为背景将其有机地串联起来,再加上各时期学者名人小传的点缀,今昔照片作为布景,一部洋洋洒洒几十万的校史就炮制出来了。在这里几乎看不到校园与社会,学生与师长的互动关系,感受不出几十年办学的艰辛与跌宕起伏的波澜,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被淹没在冰冷的数字统计和图表之中,学者大师的风范被压缩进了等身著作中难以觅寻,传承的精神文化则变成了空洞无物的口号。这样的校史能有多少生命力和可读性?又如何担当的起传承大学精神文化,乐育人才的功效?

关于校史的阅读率,笔者曾对数所高校作过调查,询问了一些在校学生和教职员,其结果却令人吃惊。在被调查的学生中看过校史的为零,因为他们不知道本校有校史一书。他们对校史的了解,主要来自于学校对外宣传报道,或通过其它途径知晓一鳞半爪。对本校历史上较著名的学者则知道一、二,但对学校传承的精神文化大多数人则茫茫然。而这些院校教职员中,看过校史的则不到百分之五,但都众口一词说没啥意思。甚至任教多年的教师,对校史也是不知所然。校史阅读的窘况,对研究和编纂的人来说,是一种不幸和悲哀。因为他们花费了大量时间和心血,从陈年故纸堆里寻找出材料编纂成书,其结果却没人知晓和阅读,即使有人勉强读了,评价极低,并没有起到“资政、育人”的效果,那就只剩下在庆典中“颂德”的功效了。

孔子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正因如此,在不断强调传承大学精神文化,多方面营造育人优良环境,通过潜移默化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采取多种途径培养学生道德品质和政治素质,其目的就是为了将他们锻造成有用之才,达到“止于至善”的境界。然而,在众多的教育措施中,有专家指出:校史教育应是高校新生入学前的必修

课,也是育人工作的起点。一个学校的历史和传统精神、学术文化氛围和校友的榜样,都将对一代代学子产生终身铭记的不可估量的影响。可见,一部好校史对后人来讲,既保存了珍贵史料,又传承了大学精神文化,这是其它教育手段所不可替代的。

但是,一部质量不高的校史却难以担起这个重任。有位专家论及:“有段时间,我对校史特别感兴趣,特别是大学校史。不过,学校当局主持编写的校史一般没什么看头,看不到什么风骨和气节,再因全国的大学在1949年后发展路线与格局都基本一致,所以我们所能看到的大学校史一到了1949年后便显得一点也不精彩了……”。<sup>2</sup>

这位专家的话虽然道出了一个实情,但却将板子打错了。有些高校校史“不精彩”,并非是“因全国的大学在1949年后发展路线与格局都基本一致”所造成的。严格地说,每所学校都有不同于其它院校的发展历程,也都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单位。由于相对独立,便会产生与其他院校不同的校园“故事”以及动人的“传说”。在这群相对独立的人们中,其生活习惯、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经过长期磨合逐渐地在人们心理深处形成了某种思维定势并延续下来,即使后来新加入的成员也必将受到无法抗拒的浸染、熏陶和影响。而此思维定势在经过长期的凝炼后,便形成了独特的教育思想和理念,又以各种不同的形式传承下来,就成为了该校“大学精神文化”。所以,有些校史“不精彩”的关键,不在于“发展路线与格局都基本一致”,而在于怎么写,以写什么为主及写作文风。这些“不精彩”的校史其主要问题有以下三方面:

其一,内容繁杂,包罗万象;共性突出,缺少个性;泛政治化,忽略情感;由此导致一本校史犹如各时期各项工作汇报和总结。在这些校史中,学校所开展的各项工 作全都涉及到了。例如,某高校为庆祝90华诞编纂的校史,其内容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党

<sup>2</sup> 汪洪亮,当前大学校史编写普遍存在的问题,百度文化社会网,2007年9月21日。

政工作、工会工作、领导体制、教学科研、外事工作、留学生教育、图书馆档案馆工作、后勤基建以及实验室、设备状况等等,一个不漏,一网打尽,如同开“中药铺”。再例如,某高校为庆祝70华诞编纂的校史,不仅内容如上相同,更甚的是,其每一章每一节都可以作为单独的汇报材料和工作总结。如第x章——快速发展的xxxx大学。第一节——锐意进取的领导班子。一、积极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立高效运转的内部管理机制。二、加强学科管理,提高整体办学水平。三、深化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四、加强科学研究,加速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五、扩大对外开放,拓展办学领域。第二节——营造民主办学氛围……,第三节——积极探索后勤社会化改革……。如此这般写法能叫校史吗?不仅全书没有个性,没有情感,就连最基本的写作方法也与史学研究背道而驰。

其二,注重宏观鸟瞰,轻视微观细节;只见学校概貌,欠缺师生互动;展示校园环境,不见精神风貌;由此导致一本校史空洞无物,清汤寡水,索然无趣。人们说,文学是人学。那么,校史也可说是人史。校园是师生的校园,学校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于师生有关。如果没有师生互动,哪来校园生活?教与学如何体现?精神文化如何传承?学者大师的风采如何展现?所以,校史的主角是师生,以及围绕他们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如果说历史沿革,重大事件,各项工作是骨架的话,那么师生互动,精神风貌,校园生活则是灵与肉。纵观民间所修校史,虽说都是写的陈年平凡小事,但仔细咀嚼起来,满口余香,十分有味。究其原因,关键点注重了细节叙述,不仅写活了人物,同时还伴随着传递了思想、文化和精神。很难想象,一本没有任何细节和气韵的校史能够引起读者兴趣。而有些校史恰恰犯了只注重宏观鸟瞰,却忽略了微观细节的毛病。

其三,八股文风,语言干涩;陈词滥调,无鲜品

尝;长驱直入,毫无波澜;由此导致了校史的千篇一律,无特色、无标志、无感觉,读罢一本,便知全部,兴趣之心,败坏殆尽。其实,毛泽东早在60多年前就曾严厉批判过党八股。而现今,在校史编纂中其党八股却大行其道,肆意张扬,并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由于党八股的盛行,校史编纂似乎形成了一个固定模式,大家也都照此办理,高度默契,步调一致,从体例、构架到章节、语言,看不出有什么很大的差异,也难以体会独到之处。这正如毛泽东所形容的:“没有一点生动活泼的语言,……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的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sup>3</sup>所以,要想编纂一本精彩的,生动的,耐看的,有回味的校史,就必须彻底摆脱党八股的束缚,代之以新鲜活泼,为广大读者所喜闻乐见的创新文风。

### 突破校史编纂困惑的路径

编纂什么样的校史才具有生命力和可读性?概括地说有几个层面。首先,是一所学校发展轨迹的真实记录,是学校兴建、发展、壮大的历史全貌。其次,是学校各方面工作成就的浓缩精华,凝炼了独特的精神文化和办学理念的展示。第三,集中反映了学校与社会,学生与师长的互动关系,再现当年校园文化和人文氛围,并为学者大师提供演出舞台。第四,确定各时期各方面融入的共同体和身份认证,体现凝聚力和向心力。第五,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兴利除弊,与时俱进,寻求未来超越与发展。

为此,有人形象地比喻说,“校史是学校师生精神家园的重要依托”,这话说的没错。一部好的校史正是通过抚今追昔,不仅可以唤醒许多陈年往事,引发追思情怀,清洗灵魂,涅槃再生,寻找到精神文化的归宿。而且还可以站在历史的高度,借鉴是非,传承精神,引以自豪,激励后人,实现超越的理想。

然而,要想写出一部具有权威性,真实性,可读性的校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接触到的校史

<sup>3</sup>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37。

看,存在的通病比较普遍,特别是离可读性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正因如此,这就使校史编纂工作似乎陷入了某种困惑,不仅被无形的枷锁所束缚,使之难以自拔,而且还贻误了育人教育,使得“精神家园”长期处于荒芜状态,无法完成春华秋实,追思情怀。鉴于此,笔者提出了三条路径,以期与同行一起突破校史编纂的困惑,走向坦途。

其一,加强校史日常研究,拓宽研究范围,为编纂高质量的校史奠定坚实基础。对一所学校来讲,继承与发展是需要经常思考的问题。如果没有继承,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发展。而校史就是最好的继承基础。遗憾的是,尽管校史研究显得十分重要,但在许多高校里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也不存在一支专门从事校史研究的队伍。实际上,校史研究在许多高校眼里,处于一种可有可无,无关大局的尴尬地位。在此思想的支配下,平日里很少有人去关心过问校史研究,更不会为校史研究设立课题项目。长此以往,既无体制保障,又无任务目标,校史研究始终只能处于低水平的状况。可以说,现今面世的许多校史,其绝大部分都不是在长期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硕果,只是校方临到筹备华诞前夕,才仓促拼凑起一支非专业“游击队”,夜以继日奋战在故纸堆里,急章草就出来的大作。而这样的成果除了冰冷的文字、数据和图表外,还能体现出多少大学精神文化和脉脉温情?又能估量出多少价值和可读性呢?

殊不知,一部有价值、可读性的校史不是单靠陈年档案堆积出来的。如果仅是通过剪裁档案材料而获取的产物,那就只能是“资料汇编”,或“资料大全”,但绝不可冠以校史之名份。校史编纂首先是个学术问题。而任何学术研究都需要有长期积累的过程,历史研究尤其需要秉承广采博收,厚积薄发的原则。校史编纂既是学术问题,那就必须通过持久深入的研究和不断发掘有价值的各种佐证材料,才能做到有效地从陈年档案中提取所需精华,加以分类整理,成为写作的依据,以至完成有价值的学术校史。而那些被临时拼凑起来的非专业“游击队”,由于过

去基本上没有接触校史研究,对学校发展历程,几度变迁,历史事件以及大批的历史人物,既不熟悉,也不了解,仅仅依靠翻阅陈年档案,霸王硬上弓,操刀干起来,在一番折腾后,一部校史就这样诞生了。试问,这样的校史能有多少内涵?多少价值?多少可读性?

校史研究如果仅重视平面研究(档案材料以及物件),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注重立体研究(亲历人的回忆和口述),并不断扩大挖掘新史料,搜寻新线索的范围。有时候立体研究成果,往往可以弥补档案材料中不曾记载的有关史料。由于他们是历史的亲历人,在其回忆和口述中还可以意外地收获许多闻所未闻的故事和感人的逸事(当然,这需要谨慎鉴别后,再作取舍。),而这些都是平面研究所无法完成的。由此可见,只有先期做好了校史研究工作,才有可能编纂出高质量,受欢迎的校史。

其二,打破常规,删繁就简,叙述大事,注重人文,强调互动,继承传统。

有些校史其最大的败笔,就在于内容繁杂,包罗万象。一所学校发展了几十年,要写可写的事情必定很多。怎么处理?只能采取删繁就简,叙述大事的写法。什么为大事?概括起来有五个方面:1、学校创建、发展的轨迹,以及所发生的重大事件。这是一所学校的概貌,必须要写(还要详细)。2、党政主要工作,教学、科研(党政主要工作概括写,教学、科研以事例为主)。而这部分绝不能采取“流水帐”的写法。3、学校与社会互动,学生与师长互动。特别是学者大师对本校学科、学术发展的贡献,以及诲人不倦的风采(以事例为主)。4、校园生活,社团活动,学校风貌。5、教育理念的形成,优良传统的延续(贯穿全书),与时俱进,创新发展的成果。杰出校友介绍(代表性)。

其实,一本书的容量必定有限,承载不了太多的内容。如果什么都写,杂乱无章,既无突出,又无重点,那就什么也写不好。校史,毕竟还是史,是缩小减量的历史。既然是史,就必须遵照写史的基本原则来进行,该详的详,该简的简,突出重点,略过一般,才

能使全书达到和谐统一,张弛有度。同时也能使读者容易掌握全书的重点,明白作者所要表达的主要意图。

一部《中国史纲要》4卷本就囊括了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一本《中共党史》就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几十年的艰苦奋斗历程。若按一些校史的写法,不知要分多少卷,写多少页码。当然,叙写中国历史和中共党史的书籍成千上万,但每本书都有各自划定的写作范围,写作角度和表达的内容。正是有众多本中国历史专著和众多本中共党史专著,构成了书写一部完整的历史画卷。这犹如“术有专攻,各有所展”,一本书不可能,也没这个能力写尽天下事。校史同样如此,贪大求全的恶果,最终将遭到读者的抛弃。

当然,在编纂校史的过程中还可以采取“大校史”概念,即以一本主校史为中心,而将其它内容分门别类的以“志”的形式分卷写,如人物志、党群志、教学志、科研志等,甚至还可以整理汇编一些史料。如此一来,既避免了内容交叉重复,又可在各自研究领域大展手脚,同时还可以减轻主校史承担的分量,预留出较大的空间,集中笔力写好学校的魂魄。

其三,在校史写作上,要区分类别属性,对表达的内容要明确定位,使之采用正确的写作方法。有些校史之所以缺乏生命力和可读性,与编纂者对校史类别属性的区分,表达内容的定位,缺乏清醒认识有关。殊不知,类别属性不清,内容定位错误,都将导致全书的写作走向歧途。首先,校史类别属性是史书体例,这就与其它著述类别属性不同。其次,校史的内容定位于通俗读物,这就与理论著述定位不同。明确了这两点,才能正确实施写作方法。校史类别属性既史书体例,就必须采用以叙事的方式为主,用事例来佐证叙事的内容,而不是喋喋不休地发表议论,进行阐述。校史的内容定位于通俗读物,语言使用要新鲜活泼,叙事内容要感人肺腑,情节布局要跌宕起伏,人物素描要栩栩如生。而理论著述则不然,需要严密的逻辑推理,高度的理论概括,明晰的条理分析,强

力的论断结果。这两者是有着天壤之别。诚然,校史是一种比较严肃的通俗读物,有其特殊性,与一般通俗读物在写法上还是有区别的,但基本原则是一致的,其具体运用上可灵活掌握。

遗憾的是,有些编纂者没有对校史的类别属性进行判断,没有为内容的表达给予定位,其结果编纂出来的校史成了“四不象”,不仅在书中出现了大段大段的政论性论述和理论性概括,甚至就连汇报材料、工作总结一类的东西也跃然纸上,阅后让人啼笑皆非,实在闹不明白,难道这也算是校史吗?这样的校史能有生命力和可读性吗?所以,庆典一过,束之高阁,无人再去问津。而传承精神文化,乐育人才也就到此为止。

上述三条路径,仅是笔者个人浅见,之所以提出来,其目的是为了抛砖引玉,通过争鸣,形成共识,为校史研究与写作的创新开辟一条通道。

后记:校史是一所高校的教育史、文化史、思想史的集合体,对其进行编纂不仅具有学术价值,同时也具有现实意义。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各高校也越来越重视校史的编纂工作。但一直以来,在大学校史的编纂中存在着诸多的困惑:如何在尊重客观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如何在写作风格和体例方面求得突破,如何通过对本校历史的梳理,写出本校的办学传统和风格特色,体现本校的文化底蕴,反映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历史变迁和高等教育的发展轨迹……对于这些,作者提出了一些见解,言辞虽犀利,却值得我们深思。

(责任编辑 姚恒)

